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4年1月30日第28期

本期目录

文摘

陈子明 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

生逢乱世

华新民 随时代风云变幻的学英语经历

书海泛舟

赵晓铃 疯狂红海洋里的小小浪花

——黄荣华《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序

黄荣华 《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前言

何蜀 《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整理后记

研余杂记

王锐 我同任冬林先生的一点交往

编读往来

边犇：2013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宗庶：2013年文革题材出版物选目

阎长贵谈杨宝智文

【文摘】

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

——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

陈子明

按：本篇原发表于《今天》2006年7月号。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

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确确实是那个十年里的中国主旋律，是毛泽东一生中最珍爱、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摆脱的一场劫难。

现在关于文革性质的种种论述，有许多还是在跟从毛泽东的指挥棒。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五一六通知”说：“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两年后，毛泽东又发布了“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文化大革命”也好，“政治大革命”也好，都是毛泽东钦定的性质。

其实，文革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人们常说，“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是摧毁文化、践踏文明。至于政治革命，从殷周换代到蒋毛更迭国号，自有约定俗成的含义，人们只知道陈胜吴广革命，却闻所未闻秦始皇革命或者秦二世革命，虽然他们都曾在政治上有大作为或大动作。而毛泽东是以“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¹自许的。“秦始皇”亲自发动，亿万“臣民”在“公安六条”的鸟笼里“奉旨造反”，实在不好说是什么革命。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文革是一场革命，不如说它是一场游戏，一场由东方式君主所导演的极其残酷的揪人、整人、杀人游戏。

文革结束不过三十年，它曾经笼罩一切的影响力就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荡然无存。当年人人佩戴的毛主席像章成了文物贩子的叫卖品，曾经印刷过几亿本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在有些图书馆里已是“馆藏书”（请把它与《圣经》、《可兰经》和《论语》做个比较）。不要说文革前的“四旧”全盘复辟，连1949年以后一度绝迹的“风水”、“算命”、“冥婚”……也重新招摇过市了。更不用说“资本主义尾巴”没有割尽，它今天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世界革命的中心”早已沦为全球资本家的“天堂”和“乐园”。不仅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文革一窍不通，过来人对于文革也恍如隔世了，连人们对文革的记忆也受到“商业和娱乐消遣”的支配²。毛泽东把文革的任务定为“斗批改”、“破旧立新”，而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又给当今的中国文化留下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十年一觉扬州梦”，昔日的一场游戏，在许多当事人那里今天已经成为一场梦。

一、文革性质：什么意义上的游戏

中文“游戏”一词，有着广泛的涵义，与之对应的英文词汇包括 play, game 等。席勒、赫伯特·斯宾塞、谷鲁斯、弗洛伊德等都曾提出过关于游戏的理论。我国社会学家郑也夫也对游戏的概念有透彻的阐述³。本文不准备详细地讨论游

¹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载《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6页。

²徐贲：《变化中的文革记忆》，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总第九十三期）

³参见郑也夫：《走出囚徒困境》，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阅读生物学札记》，北京：中国青年

戏理论，出于剖析文革的目的，只需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游戏的概念——生活中的游戏与文化中的游戏。

梁启超曾在讨论生活中的趣味问题时把生活的领域分为四部：“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¹学问又可分为求学与研究。对于青少年来说，求学是工作的预备阶段；过去曾经是一种业余爱好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工作。同样，高雅、自娱的艺术，由于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饭碗，而受到日益严重的媚俗、趋时的压力。所以郑也夫说：“对于多数人来说，游戏是与工作对立的。因此对游戏性质的探讨可以从游戏与工作的比较中开始。”²

“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其结果。有时候结果会是不尽人意，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它是工作的目的，工作是为着它而开始的。与之对比，游戏不是为了结果，而是为着过程中的愉快；绝大多数的游戏最终并没有物质上的收益。其次，多数人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带有被迫的性质，或是为他人所迫，或是为自身的生存所迫。而游戏不包含类似的被迫，它是自愿的，因而常常是愉快的。”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积极响应号召参加运动的人大都怀有一种欢快的心情，他们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也会成为被戏耍的对象，到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十年运动搞下来，很少有人成为真正的受益者，整个社会也从运动中“最终并没有物质上的收益”。

“但是，在另一些人那里，工作和游戏不是对立的，工作几乎就是游戏。尽管在今天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他们的状态毕竟迫使我们对上述的对比做出修正，也就是说，游戏与工作的区别大约只是相对的。一方面，工作有时可以成为游戏。……一位前克格勃的官员说，他酷爱设计阴谋，他每天工作 16 小时，乐此不疲。那工作对他也成了游戏。”“马克·吐温说：工作的法则似乎非常不公平，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没办法改变：工作者从中得到的乐趣越多，他所得到的薪水也越高。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社会阶层的划分除了收入、社会声望等因素外，还有一点值得参考，就是工作中的趣味性。”“另一方面，游戏有时也可以成为工作。比如打球是游戏，但是打球在职业球员那里已经成了工作；而这又是一种很特殊的工作，因为广大观众对他们的‘工作’的观赏仍然是地道的游戏；并且尽管它是球员们的饭碗，多少球员仍然很喜欢和热爱这项活动。由此可见工作和游戏的相互渗透。”

我们把游戏分为两类，一类是休闲、娱乐性的，一类是猎奇、冒险性的。后一类游戏和工作的相互渗透更为明显，可以称之为高级游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两类游戏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的游戏者角色将与工作者角色并驾齐驱，所以郑也夫才会有“游戏时代”的说法。而在文革时期，中国尚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距离后工业社会或者信息社会还很遥远。这是一个渴望工作、渴望温饱的年代，游戏对于社会来说多少还是一种奢侈品。因此，尽管说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规模空前，参与者人数超过

出版社，2004 年版；《走向游戏的时代》，未刊稿

¹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版，文集之三十八，12-17 页；文集之三十九，15-18 页。

²郑也夫：《走向游戏的时代》。下面几段中的引文均引自本文。

此前的任何一次运动，但以运动为游戏者，毕竟还是人群中的一个少数；运动时间在社会总工时中所占的比重，也只是一个少数。自始至终把文革既视为工作又视为游戏，从中获得无限乐趣的，恐怕也只有毛泽东一人。

有目的、有用的文化与无明确目的、无实用性的游戏，如何能够重叠在一起呢？因为从人类整体或者上帝的角度来看，个人的“理性”只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理性，正所谓“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在某个人看来是有用的东西，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能是有害的。哲人伟人一生的辛勤探求，最终在上帝看来可能只是一个笑话。许多种不同社会模式的试验，最终可能只有一种成为正果，作为延续下来的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其他的试验则成为过眼烟云，成为需要后人挖掘和解释的文物遗存。古人云：“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从这个角度来说，军事演习显然是有用的。但如果最终战争没有打起来，在后人的眼里，每年耗费巨大的演习岂不就是劳而无功的游戏？笔者年轻时候曾没日没夜地在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上挖地道、布地雷，说给现在的青年人听，比天方夜谭还要可笑十倍。按照人类学家的用法，广义的文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总和。结算一下几千年来的人类活动，只有极少部分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绝大部分只是有过程而无结果的人生游戏。尽管毛泽东情牵梦绕，死不瞑目，希望文革能够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但文革运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给现今中国留下的痕迹还不如他在1958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就当时而言，文革是一场少数人积极参与（多数人是“逍遥派”、“观望派”）的斗人游戏（毛泽东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¹）。从现在来看，文革是一场很少留下文化遗产的狂飙游戏。当年的狂热程度，可用林彪的一句话来代表：文革要“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他同时还说：文革的“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²。即使是现今的文革拥护者、歌颂者，也很难承认这个结论——如果文革真有这么大的成绩，又岂会出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

二、文革动机：“天师”的游戏

毛泽东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为了证明文革的必要性和及时性，把刘少奇定性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让林彪和孔夫子连成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对于毛泽东及其手下来说，就都成为“完全必要”的了。然而，解释文革的两种主要理论——权力斗争说和社会冲突说，都不能支持毛泽东的说法。

中共党内存在着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分野以及两种路线支持者之间的派系斗争，这不假。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的权力有了明显的扩大，倒向刘少奇路线的干部日益增加，但是，这还远远构不成对于毛泽东领导地

¹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32页

²《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载“人民网”。

位的现实威胁。毛泽东事后曾对斯诺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¹即使按照他的说法，党政军权力中，除了（被刘少奇和邓小平直接掌控的）党权管不了了，政权（通过周恩来）和最关键的军权（通过林彪）还是听他话的。事实上，他在文革前夕曾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²毛泽东是一个自信的人，他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把刘少奇视为真正的对手。

社会冲突说（其中包括“两个文革”或“人民文革”说）的阐释者之一郑义最近提出了“趁机造反”说³。笔者以为，尽管在“十七年”中，“官僚主义者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积怨已深，但还没有尖锐到无法压抑的程度。“人民群众”趁机造反，就说明不是逼上梁山，不反不行了；只有在最高领袖把文革“发动”起来，统治机器暂时瘫痪之后，才有机可趁、有空可钻。

文革既非必要，也非必然⁴。如果毛泽东愿意，他完全可以像打倒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样，通过党内斗争的方式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文革中种种摧残人权、灭绝人性的暴行，固然与斯大林～毛泽东式的极权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这种罪孽并非文革所独有；而文革所特有的群众造反方式，在金氏父子六十年统治和卡斯特罗兄弟四十七年统治期间就未曾出现。

张显扬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毛泽东发动文革，确实是为身后之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比身后之事更加紧迫的，是眼下的大权不要被篡夺。他对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认为相当大部分的权力已经不在自己手中。……党内已经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防止他们篡夺‘党和国家（也就是他本人）的最高权力’，他不惜以 73 岁高龄之躯，抖擞精神，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大革命’即文化大革命，把他们打倒，把已经旁落的大权统统夺回来。简单地说，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最直接的原因。”⁵

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毛泽东确实认为形势严峻，他会采取类似华国锋对付江青的办法来对付刘少奇，而采用文革这样匪夷所思的招数，正说明他对大局有着必胜的把握。应当说，他更怕的是在中国出现类似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死后鞭尸”的情况。从彭德怀事件以后，他就经常流露出这种担心。1965 年 10 月

¹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 年 12 月 18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174 页。

²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118 页。

³郑义：《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 40 周年》，载“观察”网站。

⁴余英时在《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年版）序一《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中说：“有此列斯体制及其中国特色，便必然发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断出现打死教师和其它各类知识人的惨剧。”程晓农在《中苏文革比较》（参见朱江等：《还原历史 文革 40 年纽约国际研讨》，载“大纪元”网站）中把文革定义为共产党对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认为文革始祖不是毛，而是斯大林，文革是共产党必然产生的结果，是共产制度的需要。

⁵张显扬：《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作者赠阅的电子文本。

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插话说：“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我快要去看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1966年5月5日，他对阿尔巴尼亚的谢胡说：“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¹6月10日，他对越南的胡志明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²所有这些话都说明，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为身后事做准备。

然而，仅仅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分析文革起因是不充分的。芦笛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文革，是针对党官僚集团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其目的是多重的，第一当然是为了权力斗争，把他心目中的威胁刘邓官僚集团及其权力基础搞掉；二是毁党造党，尝试摸索出一个独立于苏联模式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共产主义乐园来；三是试图将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规化，以此作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对震慑党官僚蜕化变质）的途径；四是经过革命斗争洗礼，把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锻炼改造为大公无私的坚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³概括地说，文革是一场“反修防修”的“实验性革命”⁴，一场真枪实弹的演习，一场剑走偏锋的冒险游戏。

毛泽东自己使用的是“演习”一词。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南昌对江西省负责人说：“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7月8日，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中写道：“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既然是真枪实弹的演习，毛泽东准备付出一些坛坛罐罐的代价，但整个的进程和最终的结果，都是在演习导演部（当时的说法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掌控之中。

本节标题中所谓“‘天师’的游戏”，主要用意不在于揭示毛泽东思想的道教渊源，而是要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自己打造“天师”的“不朽”⁵地

¹霞飞：《“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什么给江青写信》，载北京：《党史博览》2006年第2期。

²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126页。

³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一）》，载“罕见奇谈”论坛。

⁴汤本在《不要忘了自由和良知——评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载“华夏文摘增刊”2000年zk0012a）中说：“毛泽东把千百万人的生命的毁灭，把亿万人的生命的虚掷，成就了他的‘实验性革命’的‘成功’则是人类史上的政治灾难和政治悲剧。”

⁵里夫顿（Robert J. Lifton）用类似于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来解释“文革”的发动。他认为，中国的伟大

位。这里所说的“天师”，一是“天、地、君、亲、师”的简称，二是“天下师”（或者说“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导师”）的简称。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天师也的确可以算得上是张天师的传人。

中国道教的“正一道”（“五斗米道”、“天师道”）是由东汉张陵（又称张道陵）创立，其传人由创始人的子孙世袭，称谓为“天师”。道书载：张道陵为汉留侯张子房八世孙。传至1969年在台湾继位的张源先，已经有64代天师了，其中前59代均有中国历代皇帝给予的封号与谥号。

毛泽东在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三国志·张鲁传》。张鲁是张陵的孙子，因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被刘焉任命为“督义司马”，杀汉中太守苏固后，“在汉中割据，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以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五斗米道的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三十年”¹。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来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最让毛泽东兴奋的是他从《张鲁传》中发现：“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²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毛泽东只能当一个“儿子党”的首领，在外交上“一面倒”，在内政上“全盘苏化”。按照斯大林模式搞政权建设和所有制改造、计划经济，嚼别人嚼过的馍，对于毛泽东来说缺乏刺激性，一点也不好玩。在斯大林死了以后，国际共运群龙无首，没有人再能约束毛泽东了，毛泽东痞性大发，接连搞了两次大赌博，第一次是三面红旗运动，第二次是文革运动。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当时公开的说法是要“超英赶美”（毛泽东在1958年5月称，“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一个月后又加了码：“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³），实际上是憋着劲要甩下苏联，坐上国际共运的头把交椅。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洋洋自得地表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

领袖在晚年面临的危机，是一种对死亡后的世界状态的忧虑。毛泽东知道自己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会受到修正主义的威胁，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传。“文革”是共产主义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者是青春年少、阶级成份纯洁的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攻击老一代，这是向旧时代宣战，用心理学来说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战。参见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载徐友渔：《直面历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251页。

¹赵建伟：《析毛泽东对早期道教的原始社会主义的解读》，载“confucius2000”网站。

²《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42-151页。

³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

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月在郑州，毛泽东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在同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¹毛泽东表面上说让苏联“先过渡”，其实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腔调和心态。

三面红旗运动的悲惨结局已为人所共知。几千万人的生命代价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并没有多少分量（他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讲不要怕核战争，“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²），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权力受损、威信下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发动文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杜绝别人“秋后算账”，追究三面红旗运动导致5%人口饿死的历史责任。“吃一堑长一智”，他在进行文革这场新的赌博时，已经不敢再去触动体制的硬核——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而只能在体制的软组织和“精气神”上打主意了。事实上，文革对于中国经济与社会伤筋动骨的程度，尚不及三面红旗运动，这就更加凸显了前者的游戏性质。大跃进造成大饥荒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在经济上把“西方世界”“抛到我们后面去”³的幻想，他知道那需要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时间，他这辈子是等不及了，因此，要想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就只能从“文化革命”入手，凭借“软实力”（当时的说法是“精神原子弹”）与超级大国的“硬实力”一争高下了。

按照慕彦臣的说法，文革的理想是要“造就一个全新的祭祀系统——马恩列斯毛实际上以毛为总神祇（如林彪对毛的语录化崇拜仪式的创造，等于略去了前四者）”。他认为：所谓“人民文革”作为造神力量，是对孔子和墨子以来“人民性”的一种反动。“有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阅读经验的人应当知道在孔墨显学时代中国产生了两大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其影响至今而不绝：其一者孔儒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权，‘有教无类’成为教育自由化的经典总结；其二，墨子打破了宗教垄断，坚决地否定了孔儒‘非其鬼而祭之，谄也’的定式，以‘明鬼’与‘天志’观推动了宗教自由化即祭神（鬼）的权力不再为贵族垄断，民也可择神而祭甚至多元选神。”“从西汉平帝开始，到东汉末乃至魏晋（包括曹氏父子），流及北宋再至清代，都出了‘禁淫祀’的反宗教自由法条（案）。‘人民文革’也

¹同上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

²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26页。

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634页。

在这一历史逻辑中，它被毛泽东的反宗教策略牢牢吸住。砸烂一切与怀疑一切，结果等同于‘禁淫祀’，即除毛泽东这个现世神以外，其他的祀祭（信仰）都成为罪恶。”¹

中国旧的祭祀系统是“天、地、君、亲、师”，是一个多元化的体系，新的祭祀系统则要把这五者集于“毛泽东这个现世神”一身。帝制中国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天生之，地养之”，除了交“皇粮”（偏远地区还不用交），皇帝老儿也与我不相干。到了毛泽东一手缔造的“新社会”，结婚生养都要经过“单位”（包括农村的“大队”）批准，种什么粮食和怎么种都要上级（从“公社”直至最高当局）来决定，真是“天大地大”不如毛领导下的“党大”了。毛泽东“焚书坑儒”的规模，超过中国“始皇帝”百倍、千倍、万倍，就政治的权威和全能而言，自然是“君”不如“毛”了。1952年陈寅恪写过一首《吕步舒》七绝，诗曰：“证羊见惯借锄奇，生父犹然况本师。不识董文因痛诋，时贤应笑步舒痴。”此诗首二句便分指子女清算父母、学生批判老师。发展到文革前夕，“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氛围已经形成，在笔者这一代人中不少人都有因为“听毛主席的话”而与父母顶撞、冲突甚至决裂的经历。但是，毛泽东还不满足于对“天、地、君、亲”的超越，他曾假惺惺地说：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²的确，他对“伟大导师”情有独钟，因为他不仅要控制人们的行为，还要控制和改造人们的心灵。了解了毛泽东对于“天师”的内心渴求，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对政教合一的五斗米道赞不绝口，甚至在文革中默许“红海洋”、“主席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类“神道”的崇拜仪式。

毛泽东的理想绝不限于成为中国人的“天师”，他还要成为全世界人民所仰慕和崇拜的“天师”。中国在一段时间里向世界输出革命包括输出文革，由于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外交发生180度的大转弯，而被掩盖和遮蔽了。1965年，毛泽东通过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了“世界的农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包围“世界的城市（北美、西欧）”的“今天的世界革命”理论。³因为毛泽东手头没有足够的钢铁、坦克、航空母舰和热核导弹，他无法像希特勒和勃列日涅夫那样去扩张和争霸，而只能输出“精神原子弹”，指望由“精神变物质”。“五一六通知”中说，文革不仅“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说：“毛主席一声号召，所有机关、学校都起来响应！……这个就是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这个力量准备好了，就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中国就能发展世界革命。……一个政治上有眼光的人，要革命的人，对目前还不满足的人，中

¹ 慕彦臣：《作为宗教反动的“人民文革”——答火戈先生询问》，载网刊《议报》，第248期。

² 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³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直到陈毅已经成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1967年3月5日，他还在表扬中国驻外“使馆的大多数同志是革命的闯将，……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¹在文革高潮时期的报刊上，充斥着“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自慰口号。

1967年11月24日新华社报道：文革一年多，各类毛著25种，460多万册，发行到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为此发表短评说：“《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势，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由于对外输出文革，向别国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仅在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就和当时50多个建交国中的30多个发生了外交纠纷，有的断交，有的相互驱赶外交人员、新闻工作者和留学生，有的发生排斥华侨华裔事件。²中国的独生子女在家里可以像“小皇帝”一般胡作非为，在社会上则不能随心所欲；同理，中国的毛天师可以在国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到了国际上就没有多少人买你的账了。中国在全世界的朋友，一度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家。而为了维持这个惟一的“铁哥们”，中国为200万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将近9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和军事援助。³这样的玩法是连素来大手笔的毛泽东也玩不起了。因此，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及毛泽东心甘情愿地充当美国反苏战略的小伙计之前，他就收敛了当“天下师”的野心。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已经完全丧失了革命进取心，满足于“井水不犯河水”和“闷声发大财”了，对于尼泊尔毛派共产党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攻城略地，他们完全没有一点“同志”的欢欣和“出手帮一把”的意愿。

三、文革主力：“白相人”的游戏

文革这场游戏是由毛泽东设计和发动的，但只靠他一个人是玩不转的，他需要有帮手、打手和捧场的人。本节将讨论文革玩家的身份、资格和出局问题。

文革在毛泽东年代的大号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你把“无产阶级”理解为产业工人，就大错特错了。王希哲说：“而工人阶级呢？作为自发的工人运动，绝大部分都是以‘老保’的资格站在学生们的对立面的，他们本能地要保卫自己的利益。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泽东看到了这样一种不利的形势，他批示道：‘此件请看一看，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请注意：毛泽东看到了工农运动阻止他帝制复辟计划的实现），拟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可干预学生运动。’我们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造诣的‘理论家’应该明白，如此庞大的‘老保’工农运动，是不可能由几个恶意的并与人民有仇恨的官僚挑起的。”⁴绝大部分工人是文革的对立面（“老保”）和冷眼旁观者。绝

¹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11-12、134页。

²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134、144页。

³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313页。

⁴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载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2月号。

大部分农民也是如此。毛泽东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严格地说应当是无产无业阶级，他们并不是现实中的工人农民，而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

梁启超曾说：“我以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成对待名词，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成对待名词。什么是有业阶级？如农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内）、买卖人（商店东家和伙计都包在内）、学堂教习、小官吏与及靠现卖气力吃饭的各种工人等，这些人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什么是无业阶级？如阔官、阔军人、政党领袖及党员、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强盗（穿军营制服的包在内）、乞丐（穿长衫马褂的包在内）与及其他之贪吃懒做的各种人等”。“无业阶级的人脸皮真厚，手段也真麻俐，他们随时可以自行充当某部分人民代表。路易十四世说‘朕即国家’，他们说‘我即国民’。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做饭碗。”¹也就是说，无业阶级最喜欢代表“人民”，最喜欢搬弄“主义”，最热衷于“革命”。

梁启超认为在中国人中，有业阶级是多数，无业阶级是少数，“有业阶级战胜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无业阶级征服有业阶级便亡国灭种”。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他要中国人全都变成无产无业阶级。实行全社会公有制后，就人人都是无产阶级了。但这还不够，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即“五七指示”）中还提出了全社会无业化的设想——不论军人，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兼营他业，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都要批判资产阶级。²取消了“术业有专攻”，每一个人都是“万金油”和“螺丝钉”，都随着毛泽东的号令搞“大批判”、“斗私批修”，人人无产无业的大同世界就将出现。

“社会主义新人”与旧人的本质区别在于，他已经从人性中排除了“经济人”和“政治人”的因素，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人”了。“经济人”有利益和享乐的考虑，“政治人”有权力和自尊的追求，“社会人”则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没有独立的人格，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以最高领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现实中国的农民还有“产”——住宅、农具、自留地、自留畜等，工人还有“业”——车、铣、刨、磨、钳等，他们都还没有摆脱“经济人”的本性，因此，只有尚无社会经验的青年才有培养成“社会主义新人”的可能性。

李月军说：青少年学生的心理与人格特征远未定型，他们本不应该在以成人为主的社会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在文革初期，年青幼稚而又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被塑造成充满“革命狂热”的“红卫兵”一代，却被利用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文革前的政治社会化把具有动员性、革命性、二元对立性等特征的政治文化内化到他们的意识之中，为他们设定了所谓的“革命接班人”的社会政治角色定位，刺激了他们原有的对成人角色的渴望感，更强化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责任感；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对“革命”有无比的向往甚至崇拜感；动员型政治文化刺激了“红卫兵”的反叛意识、张扬个性的心理及表演欲，唤醒

¹梁启超：《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1-2页。

²转引自《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966年8月1日。

了他们在权威体制造成的压抑感下的独立意识萌动；主流政治文化制造的政治危机感、焦虑感与仇恨意识也被内化到青少年学生中，变成了他们的心理渴求；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则满足放大了他们的偶像崇拜需要。动员型政治文化与“红卫兵”一代青少年心理的相互激荡、积累，把作为微观个体的“红卫兵”联合成一个同质群体，使“红卫兵”们产生了体认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共享激进政治情绪，进而将之投入到文革这场社会政治运动中去。¹王希哲说：“一九六六年，他便蒙蔽和煽动了一大批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利益的青年学生起来造反，发动了一场‘红卫兵’法西斯运动。这样，只是这样，才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最最反动的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²

据万润南回忆，1966年8月4日，邓小平对清华大学的学生说：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³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从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累计达1100多万人。毛泽东下这样大的本钱动员青年人参加文革，也是有其苦衷的。他并不是不想让成年人跟着他的指挥棒起舞，但是，尝过历次政治运动酸甜苦辣的人，都深知毛泽东“秋后算账”的“阳谋”，不会轻易地上当了。而且，刚刚从三面红旗运动导致的大饥荒中喘过一口气来的人，对于毛泽东、刘少奇两条路线的是非曲直，有着自己基于常识的判断。因此，毛泽东只能让红卫兵和造反派——其主体是不通世故、不明真相的中学生、大学生和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工人——来充当文革的主力。而大学生中政治比较成熟的人，如曾担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的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朱成昭，在1966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三子”的游戏：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⁴

毛泽东所属意的无产无业无心无肺的“新人”其实很像一种“旧人”——当年上海滩上的“白相人”。旧时的白相人是指那些没什么正当职业和专长，却精通吃、喝、嫖、赌的人。毛时代的白相人只有少数红卫兵或造反派头头有私下里吃、喝、嫖、赌的机会，多数人寻求刺激的方式是打、砸、抢、烧。白相人是一种正常社会的寄生物，是非生产性的，因此既不能在全社会普及化，也不能持久地存在下去。李月军说：当毛泽东最终把整个“红卫兵”群体交给“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去“再教育”后，“红卫兵”群体的“革命”激情终于在生存的艰苦挣扎中磨尽了。⁵这是文革白相人的必然归宿。

青少年天生就有很重的玩心，不用考试，不用上课，在玩玩闹闹中就“咸与革命”了，当然是很开心的事。这时，马上就出来了喝令阿Q“不许革命”的年轻的“赵老太爷”——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他们的“三论无产阶

¹李月军：《锻造激情的木偶——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总第91期）。

²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³万润南：《清华岁月（13）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载“罕见奇谈”论坛。

⁴万润南：《清华岁月（13）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

⁵李月军：《锻造激情的木偶——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

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捧出了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尚方宝剑，宣称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取得了毛泽东的赞赏。但是，他们紧接着就搞出一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宣称“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这就是说，参加游戏的门票掌握在他们手中，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限于“黑五类”、“狗崽子”，而是指所有的非“红五类”，其中包括1945年以后“参加革命”的中共基层干部和普通职员子女）不仅不能参加红卫兵，连参加“红外围”的资格也要经过他们审核批准。而且，他们只许造“牛鬼蛇神”的反，不许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血统论本来是毛泽东几十年来所鼓吹的阶级论的自然延伸，中共建政十七年中所贯彻的“阶级路线”也正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不像“老红卫兵”如此毫不隐讳。然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清算“老阶级敌人”，而是要揪出政权内部的“新阶级敌人”，用林彪的话说，“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¹。“老红卫兵”以为文革只是他们爹妈革命的模拟和复制，这就破坏了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惹恼了“江青阿姨”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使自己在成为文革的第一批闯将后随即成为运动的第一批绊脚石。事实上，出身问题贯穿了“三年文革”的始终，不仅是“保爹保妈”的“老红卫兵”之类的保皇派与造反派的分界标志，也是造反派中所谓“派性”的源头之一。譬如北京中学生的四三派和四四派，出身不好的人在四三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四四派则以这一点作为攻击前者的口实。

“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包括“血统论”在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明确了文革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党内各级当权派后，游戏者的资格问题在一时间被淡化了。芦笛认为，1966年年底、1967年年初乃是“解放”后最进步的短暂时期。²在与“血统论”的斗争中，涌现了文革时期（而非文革运动）的一位“大英雄”——《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刘晓波写道：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的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³遇罗克在“红色恐怖”盛行的1966年8月14日，就写下《出身论》初稿，随即被单位关押审查。在“最进步的短暂时期”里，遇罗克和弟弟遇罗文、郝治、牟志京、王建复等人“趁机造反”，自办了一份《中学文革报》，1967年1月18日，该报第一期以三版篇幅发表了《出身论》，立刻轰动了北京乃至全国。但是，遇罗克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造反”范畴，他不仅反对皇帝和贪官，而且反对造成皇帝和贪官的体制。尽管他也采用了一些语言上的伪装，但瞒不过毛泽东体制的忠实鹰犬。1967年4月

¹林彪同志重要讲话（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同志的讲话），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320号。

²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三）》，载“罕见奇谈”论坛。

³刘晓波：《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载“民主中国”网站。

14日，中央文革小组把《出身论》宣判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遇罗克作为“现行反革命”受到公审，被判处死刑后押赴刑场枪决。

游戏在英语中既可译为play，也可译为game，两者的含义有区别。孩子“过家家”，情侣“花前月下”，属于play；体育运动、棋牌游戏、电脑游戏，属于game。前者是无规则的或者是自定规则的游戏，后者是有前定规则或外在规则的游戏。毛泽东不允许卜大华、骆小海（“红卫兵”创始人，“三论”的作者）和遇罗克自己play，他只允许他们参加已经安排好情节的game；但是，他本人却不遵循任何规则包括他自己制定的规则，自始至终都在随心所欲地play。由于毛泽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还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所以他能够在文革中始终保持赢家的地位。又由于这场game的规则朝三暮四，变化莫测，绝大多数积极参加者都先后被判违规出局。

“老红卫兵”忘乎所以，想要由自己来认定文革游戏者的资格，这当然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但是，一旦群众造反的大势已成，刘邓司令部土崩瓦解，他就要清理门户，防止有人“浑水摸鱼”、“趁机造反”了。毛泽东的资格认定标准分为两类，一类是死规定，一类是可以随意伸缩的活框框。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其第四条规定：“21种人”——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从而为“革命政权”和“革命群众”任意凌辱、欺压、迫害甚至屠杀这些人提供了“合法的”依据。由于“21种人”中的最后一种是“家属”，从“家属”又很容易扩大到“亲属”，使其覆盖面达到了总人口的一个多数。

以上“21种人”都属于广义的“历史反革命”及其家属，而“公安六条”最核心的内容是其第二条，即对“现行反革命”的认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革命标语，喊反革命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于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以及受到前者保护的“革命干部”。在“最进步的短暂时期”，曾出现过两条强势的革命口号——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和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公安六条”一出来，它们就被戴上了笼头和去了势（骗了蛋）。毛泽东的“人民～敌人”辩证法，在文革中达到极致。在反右运动中，他起码还要制定“六条标准”，而根据“公安六条”的第五条，只要掌权的人认为你“利用大民主，或者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而不论是何种“反动言论”，你马上就从“人民”

的行列坠入了“敌人”的十八层地狱。由林立果手下“小舰队”成员于新野执笔的《“571”工程纪要》指出：“他（指毛泽东）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批，各个击破。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¹在外交部全部工作人员 3000 人中，仅“五一六分子”就抓出 1700 名²，就是“人民～敌人”辩证法以及“一小撮～一大批”转换机制的一个例证。

郑义说：由于历史条件之限制，文革造反派不可能提出三权分立等完备的现代民主思想，但他们所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已然构成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致命威胁。³其潜台词是：即便造反派的追求没有跳出毛泽东“人民～敌人”辩证法的框框，但对于有权享有“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的“人民”来说，已经意味着一种“平等”或者说“解放”。然而，这一叙述距离当时的事实相距甚远。在文革中谈论“巴黎公社式的”民主，专利权不属于造反派，而属于毛泽东。毛泽东在 1966 年 6 月 1 日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重大⁴。8 月 8 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宣称：“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但是在红卫兵、保皇派掌控文革领导权的时候，一味推行血统论，根本就没什么心思搞什么民主选举。到批判“资反路线”，造反派取代保守派崛起于文革舞台后，除了极少数“新思潮”的鼓吹者，“巴黎公社”这样的字眼已经很少再被提及了。因为毛泽东本人改变了主意。从 1967 年“一月革命”开始，革命造反派“夺权”就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取代了“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而“夺权”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军队的支持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与“人民”没有丝毫关系。

因此，不算个别如流星般转瞬即逝的案例，从整体上说，“文革造反派……向往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一种历史的虚构。相比而言，胡平的概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他说：文革就是一场比赛革命的革命。文革中群众之间的斗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异端或异教对正统的矛盾，而是表现为争夺同一个正统的竞争，争夺同一个权威支持的竞争。文革的参与者必然会关心自己在这场竞争中的地位，他们希望自己能跑在众人的前面，至少是不要被运动所抛弃。换句话说，大家都希望通过运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显示出自己比别人更革命，唯恐被众人视为不革命或反革命。⁵竞赛革命或者表演革命，进是为了“夺权”，退是为了自保。而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一是要“无限忠于毛主席”，二是“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人民文革”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分清“延安与西安”——人民

¹ 《林立果 571 工程纪要全文》，载“博讯”网站。

²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239 页。

³ 郑义：《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 40 周年》。

⁴ 《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年版，601-602 页。

⁵ 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载《北京之春》，1996 年 6 月号。

与敌人，革命与反革命。这是一条在背后不断抽着造反派向极左狂奔的鞭子。“照理说，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路线本身就够左的了；然而在实践中，群众的做法往往比毛的理论还要更左，有时候，甚至连毛本人都无法对那些极端行为的泛滥实行有效的约束。究其实，这种极端行为的泛滥正是那种政治结构和政治运作机制的自然结果，尽管毛本人不一定对这种效应有清楚的自觉。”

毛泽东本来只想让人们在文革中“白相”一番、演习一场，就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鸣金收兵。然而，他未能如愿。因为，不论是红卫兵、造反派，还是参与了文革运动的其他人，只要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尚未大功告成者，其人性中总是或多或少地潜伏着白相人以外的其他维度，只要条件适宜，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经济人和政治人的本来面目。芦笛写道：“压力一旦从普通群众转移到老干部头上去后，许多老‘阶级敌人’自然就‘跳了出来’。以往历次运动的受害人挤满了各级政府机关，要求平反；工厂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增加早被冻结了的工资；临时工和合同工要求转为正式工，享受和正式工人一样的福利；就连复员、转业、退伍军人都组成了庞大的‘兵团’，要求为他们服役结束时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予经济补偿。”“不幸的是，这种健康趋势尚未来得及蔓延全国，形成气候，便被中央和造反派那新时代的积极分子们在短期内合力扼杀了，因而在文革史上无足轻重。”¹

文革中经济人最突出的代表是一个争取合同工、临时工权益的全国性群众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该组织于1966年11月8日成立，主要负责人“王振海的父亲是国府警官，周牧的父亲是国军将领”，“他们两人都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被扫出学校大门。”“全红总”于12月25日封闭劳动部，26日封闭全国总工会，同日受到江青的接见和支持。1967年1月2日，“全红总”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签署《联合通告》，通告保障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在文革期间“一律不得解雇”；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4日，江青指示缓发《联合通告》。8日，“全红总”在西苑饭店会议厅召开“五大洲革命左派座谈会”（原定名称“国际记者招待会”，因太敏感而改），受到周恩来“家丑外扬”的严厉批评。22日，“全红总”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有30万人参加的集会示威。23日，一批打着首都三司、二司、一司等等旗号的红卫兵受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来包围全总大楼，捣毁“全红总”总部，公安机关也于同日绑架了王振海。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勒令所有全国性组织一律撤销。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文革期间对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处理问题的通告》，宣布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以取消。各省市劳动局根据“三团体”的联合通告所决定的一切文件，一律作废。此后，“全红总”负责人均被逮捕和判刑。周牧（现名方圆）被判刑二十年，其他人从十五年到五年不等。²

¹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三）》。

²方圆：《从“全红总”谈“人民文革”》；李伯特：《“全红总”始末》；载“中国工党”网站。

文革中政治人的典型有“新思潮”诸君¹，还有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里面写到的刘凤翔等人。“他地位曾经很高，50年代是湖南一家报纸的总编辑，被打成右派，他对这个体制可以说看得彻底清楚，他想从文化革命、天下大乱的局面中实现一些自己的想法，他想，既然把大家发动起来了，而且无产阶级专政机器也砸烂了，就给人们留下了活动的余地。他就联络了一大批右派，非常清醒地、非常自觉地既要改变他们右派的命运，又要改变中国当时那种专制制度。”²刘凤翔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组织反革命组织‘中国劳动党’，煽动上山为匪，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³

其实，毛泽东不仅不能容忍政治人和经济人，一经发现就马上打入另册，从文革游戏中驱逐出局，他对于纯粹白相人的游戏也越来越不耐烦了。郑也夫说：“象棋、围棋、足球，都是对古代战争或争斗的模拟。为什么要模拟？为了满足我们说过的人的三种需求中的一种：牛逼，即超越他人的愿望。当人类完成了这种模拟后，他便可以在两种空间——实际生活和模拟实际生活的游戏中，满足他力争超越他人的愿望。”⁴狭义的游戏也要分个胜负输赢，也要满足人们对于牛逼的需要。文革中的“派性”顽症，正是源于这样的一种自然人性。毛泽东只许自己一个人牛逼，而不允许其他任何人牛逼，文革这个游戏就越来越没有意思，越来越玩不下去了。因此，“斗批走”、“斗批散”，让白相人统统去生产第一线劳动改造，就成了“无言的结局”。

四、文革逻辑：超越于游戏者的游戏

毛泽东固然想让文革成为他一个人的 play，但是，不论他多么“英明睿智”，多么“大权在握”，他却做不到这一点。根据加达默尔的游戏自我主体性理论，一切游戏活动都是一种被游戏过程；游戏不是游戏者的单纯主体自由的行为，它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独立于那些从事游戏活动的人的意识；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是游戏的往返运动，它必须始终有一个他者在那里存在，而且这个他者用某种对抗活动来答复游戏者从自身出发的活动；游戏的魅力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主宰，在于吸引和束缚游戏者于游戏中的东西。⁵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既是文革的发动者，也是文革的俘虏和牺牲品。

我们可以说，文革期间有两个运动——文革和反文革，而不是两个文革——毛文革和人民文革。文革不断地消灭“对手”和“敌人”，同时又制造了更多的“对手”和“敌人”，因此毛泽东直到去世也没能从文革中自拔出来。文革运动诱发和催生了反对文革的运动，反文革运动十年生聚，最终以四五运动的形式爆发出来，战胜和终结了文革运动，这就是文革的基本逻辑和线索。文革与反文革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两个运动，而不是勾肩搭背、相伴而行的两个运动。

¹例如乔俊礼和杜文忠、李文博，遇罗克、张祥龙和张祥平，杨曦光（杨小凯）、鲁礼安等，参见印红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与思想探索（1966-1976）》，北京大学博士论文，第三章。

²徐友渔：《16学者在京举行“文革”研讨会》，载“多维新闻网”网站。

³杨小凯：《建新农场》，载“博讯”网站。

⁴郑也夫：《走向游戏的时代》。

⁵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130-142页。

王希哲是“两个文革”和“人民文革”说的始作俑者，而他在提出此说时，所要表达的是和“两个运动”说非常相似的意思。¹他说：“我们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把它理解为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相对立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文革从一开始，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斯大林式官僚国家机器中最反动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剧烈冲突起来。于是，伴随着毛泽东的每一步胜利，都是人民对他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和抵抗的进一步加强。经过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一年感性认识的积累，经过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比较理性认识的积累，终于在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爆发了人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而毛泽东又是站在被官僚们压迫的人民一边并有解救他们的慈悲心的，那么事情就应该会是这样：随着运动的深入，必然是拥护毛泽东的队伍的壮大。但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事情恰好相反：第一阶段，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和小部分工人是跟毛泽东走的；第二阶段，一九七四年袖珍版的文化大革命，当年的红卫兵和几乎全体工人阶级都不理睬毛泽东的号召了；第三阶段，一九七六年，‘红卫兵’和工人们不但不听话（注意，这些话还都是一些‘珍贵思想’），反而统统都造反了，站到反对毛的一边了”。²他强调李一哲思潮与极左思潮的不同：“李一哲思潮是向右走的，不是向左走的，它汲取了极左思潮的养料，但它不是‘极左思潮’哺育出来的。”“一九七六年的四五运动，无论在南京、北京、上海，其参加者只可能是反极左思潮的同志、朋友或同情者，而不可能是杨曦光、鲁礼安等人代表的‘省无联’、‘北决扬’。如果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六这八年时间里，杨曦光们仍发展着极左思潮，没有任何向相反方向的反省的话，他们不但不可能投入‘四五’运动，不可能并肩与曹志杰、王军涛、陈子明站在一起，相反，他们只可能是‘四五’的敌人”。³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王希哲、刘国凯、郑义、方圆、武振荣……的“人民文革”说构成一种“家族相似”。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不难发现，家族远亲之间的相貌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对已经发表的文本进行分析，可以作出以下判断：王希哲既否定毛文革又否定毛主义（即别人向他推荐而被他拒绝的“珍贵思想”，或者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从毛泽东思想官方定义中所剔除的那一部分毛泽东晚年思想）。方圆彻底否定毛文革而部分肯定毛主义。他说：“‘毛文革’的根本目的，是要把中共的‘党天下’，变成毛的‘家天下’。如果把毛反政敌的特权，解释给人民争‘普遍权利’，把毛反对非毛族类的官僚，解释为反对中共的官僚制度，那真是天大的笑话。如果以此把‘人民性’的桂冠戴在这个独裁暴君的头，那就不是天大的笑话，而是天大的屁话。……言行不一是很多人的毛

¹此文完成后，笔者 google 到，王希哲在答复李宪源时曾说过：“人民文革”“当然可以”称为“人民反文革”。“王希哲 26 年前提出这个名称时就说，‘你叫它什么都可以’。”（王希哲：《也论人民文革》的跟帖，载“多维博客”。）但是寒竹批评道：“如果把这种反文革的民主思潮看成是文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如同把反法西斯主义运动看成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王希哲先生正是把这二者混淆在一起。”（寒竹：《我们能够从文革中学到什么？——兼答王希哲，武振荣先生》，载“多维博客”。）

²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³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此文发表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号《中国之春》，后王希哲略有校订，载“罕见奇谈”论坛。

病。毛也有这种毛病。‘毛主义’中有不少好东西，但‘毛文革’中很难发现有啥子好东西。”¹武振荣则基本上既肯定毛文革又肯定毛主义。

武振荣划分了“毛泽东的，共产党的和人民的”三个文革。²“毛在（1966年）8月5日的这一天，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砍下了一刀，‘刀下见菜’的结果是一个‘文化大革命’被‘截为’两节：8月5日之前的一节属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属于中国人民；如果说这样的两截没有任何的内在的联系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名字却是唯一的联系的桥梁，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又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于是一个完全的失去了联系的两截子运动，就被一个毛给连成一气了。”前一个是共产党的“害人的运动”，王友琴博士的“文革受害者纪念园地”中那些接受香火的在天之灵大都是在这个运动中“殉难”的；后一个是解放人的运动，是属于那个时代的“7亿”中国人民的运动。毛泽东的文革被一分为二，前一段与共产党文革“是难脱干系的，共产党的错误的一半应该由他来承担”，后一段“毛站在‘人民的一边’，毅然决然地支持人民造反和人民解放”。³如果说毛文革和人民文革最终还是分手了，那么，是造反派“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筹码而已”呢，还是毛泽东成了造反派用来打鬼的“钟馗”？多数人认为，不论从文革的发起、进程和结果来看，结论都应当是前者。例如王希哲就指出：“今天他们（——指造反派）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那并不是他们当初感受到了什么压迫的结果，而是受了毛泽东欺骗的结果”。⁴武振荣则认为是后者：“66运动中的毛泽东何尝不是我们手中的一个筹码呢？运用它我们砸烂了专制社会，砸烂了‘公、检、法’，打倒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并且用毛的词汇把自己打扮成正而八经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用毛的话来说，这是‘借助于钟馗打鬼’。”武振荣选择了“把人民在运动中的作用看得高于一切”这样一个角度，“我不敢说我的研究是‘客观’的，但我敢保证它是公正的”。⁵这种“人民性”高于“客观性”的研究取向，显然深得毛主义的精髓。

如果要复原历史的真相，武振荣就需要用事实来说明，“公、检、法”在文革中真的被造反派“砸烂”了吗，还是在军管后变得对“阶级敌人”（包括被毛泽东所抛弃的造反派）更加凶狠残酷了？如果“你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炮打’共产党各级司令部，从政治上解放人，还权利于人民的运动”，它就必定是这种运动，“凡所有不甘当奴隶的人，所有认为自己是人，……都应当时时想着它，期待它，并且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促成它的发生”，这就未免太一厢情愿了。即便是为了民主的目的而去发挥“想象力”，争取“话语权”，也不能仅凭“信仰”和“直觉”，就让“观念先于事实”，充当毛泽东式的“真理代言人”。

6

¹方圆：《“毛文革”真有“人民性”吗？——与闲话先生谈几句关于“人民文革”的闲话》，载“独立评论”论坛。

²武振荣：《刘国凯〈论人民文革〉一文读后感——民运人士应该纪念“人民文革”》，载“新世纪”网站。

³武振荣：《论毛泽东》，载网刊“民主通讯”，2005.1.27a。

⁴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⁵武振荣：《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我经历过的1966年政治运动》，载“博讯”网站。

⁶参见武振荣：《论民主的想象力》、《论民主的话语权》、《论民主的信仰》、《论民主的直觉》、《论政治生活

武振荣明确反对“非毛”。因为“这个精神上的毛，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中国人民以伟大政治解放的方式要求精神上的进步与发展有关，……他是这个伟大事件中的一个构成因素，……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同它粘连在一起。那个价值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所以，“毛的上述预言可以被我们取来一用，变成我们的声音中的一个音符，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非’他呢？”。¹武振荣至今仍是毛泽东文革遗产的收藏者、鉴赏者和鼓吹者，这一点把他和几乎所有的其他“人民文革”论者区别开来。然而，可能是以辞害意，造成对读者的误导，也可能是在语言游戏中把自己给绕糊涂了，或者不知不觉中受到家族远亲的影响，当王希哲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坏，就是坏，就是坏！这条定了，不必说了。问题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一定坏’吗？”²他和武振荣之间的差别似乎正在变得模糊起来。难道王希哲笔下的“人民文革”从过去“向右走”的反革命运动变成了现在“向左走”的革命运动了？或者说，由于时过境迁，作为第一次文革理论基础的毛主义现在又变成“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香饽饽了？行文至此，王希哲还没有正面阐述这个问题，希望他能够以自己的文字消除笔者的疑惑。

游戏者被游戏，其中的一个含义是，游戏者自身会在游戏中被改变。因此，文革运动的发动者和积极参与者，也会表现出反文革的一面，或者干脆变成反文革运动的先锋和骨干。下面逐一讨论反文革运动的三个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平衡运动，“走资派”的抵抗运动，群众中的反抗运动。

笔者曾说：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在 70 年代，毛主义的官方阐释者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教义继承人是王洪文；但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一件事他成功了，第二件事他失败了。在他生前，四五运动的斗争锋芒就指向他晚年生命赖以寄托的文革；他的尸骨未寒，他“放心”的接班人便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携手埋葬了毛主义。王力雄在《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一文中很好地描述了毛泽东作为毛主义者的一面，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他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另一面。事实上，毛泽东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即使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旧政府”与“新文革”之间搞折衷、搞平衡：当后者要把前者彻底打倒，使得斯大林模式完全无法运转时，便在 1967 年 2 月、8 月以及 1972 年和 1975 年支持“旧政府”一把；当前者的气焰压过后者，有可能否定毛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时，便屡屡发动

中的观念与事实》、《论民运队伍中的真理观》，载“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

¹武振荣：《恐毛、非毛与出毛——从〈预言的应验〉一文说起》，载“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

²王希哲：《请大家来参加“中国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问答游戏》的跟帖，载“多维博客”。

²王思睿：《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1 年第 2 期。

“反二月逆流”、“反右倾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给“新文革”打气、鼓劲，扶植他们“继续革命”。¹

“红司令”不同于他手下的“红卫兵”、“红小兵”，他一身二任，既是文革游戏的大玩主，又是专制政权的统治者。他不能像年青人那样不顾一切地疯玩，他随时还要惦记着不能乱了自己的方寸，不能动摇政权的柱石。

毛泽东的平衡运动，首先是在毛文革与毛党魁之间搞平衡。这意味着他常常要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文革初期，毛泽东曾鼓吹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呼唤“二十世纪北京公社”；但是仅仅半年之后，“上海人民公社”真要成立了，他又极力贬低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呢，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他还否定了普选原则：“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最终，他亲手将“上海人民公社”扼杀在胚胎中：“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全国都改，就得发生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有人不承认，很多麻烦事，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²左派理论家杰姆逊说：“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究竟还是在他自己发动的运动所产生的最终结果面前退缩了：在文化革命的决定性时刻，在上海公社诞生之际，他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有效地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这一逆转所产生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³

其次，是毛泽东在“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搞平衡。事实上，以江青为主要代表的“文革派”始终只是一批高级白相人。“尽管张春桥、姚文元长期把持舆论阵地，尽管一些造反派担任过革委会委员、常委甚至副主任的职务，但他们始终没有掌握过真正的权力，革委会的实权一直在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军队干部和老干部手里。因此，毛主义在‘文革’时期便很难有机会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⁴芦笛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只是基于对旧式革命的幻灭，以及朦胧如梦幻的对人间天国的憧憬，便毅然发动了砸烂旧党国的人民革命，却因彻底缺乏政治设计能力，毫无取代旧制度的新政体蓝图，更因本人深刻的内心矛盾，使得他连具体的革命纲领都提不出来，连革命对象都无法确定，便只能试图以调和折衷的方式收场，却又限于极度狭窄的视野，不能用西式妥协建立新式政体，最后不但未能建起他的梦中模糊天堂来，就连旧式革命改朝换代的成就都没有取得，使得文革从奋起推翻党官僚的人民革命初期，进入人民为党内两派打代理战争的中期，最后蜕变为人民因厌倦退出代理战争、只剩下党内两派角斗的末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文革都是毛一生的最大失败，充分体现了他作为建设性政治家的惊天动地的无能。”⁵

¹王思睿：《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2期。

²《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9年，667页，转引自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载“网上文革博物馆”网站。

³转引自郭建：《当代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幽灵》，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⁴王思睿：《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

⁵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二）》，载“罕见奇谈”论坛。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

毛泽东内心偏爱“文革派”，但是又不能完全倚重“文革派”。只要“文革派”的权力一膨胀，国民经济形势就迅速恶化。1967年“二月逆流”后，毛泽东用中央碰头会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能，而中央文革是碰头会的主体，其成员占碰头会12名成员中的8名。然而，由于出现了7、8、9月的“全面内战”，当年经济出现10%的负增长，毛泽东“挥泪斩马谡”，端出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名文人作为替罪羊，新加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四名军人，碰头会的组织结构发生改变，但实际主持人仍是江青。中共“九大”以后，政治局工作会议取代中央碰头会，军委办事组成为政治局工作会议的主体，其成员占了政治局工作班子13名成员中的7名，真正的主持人也由江青变为周恩来。军方代表实际上也是“旧政府”的组成部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的组合完全压倒了对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毛泽东只好把自己这一超级砝码放在天平的左侧，先后拿掉陈伯达和林彪集团，让“文革派”扬眉吐气，重握权柄。但随即出现国民经济在文革期间的第二次谷底，于是毛泽东再次倚重周恩来和启用邓小平。王力评论说：毛泽东“原想是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大演习，要让所有的人都表演一番。但魔鬼放出来以后，收不回去了。依靠小将，不行；依靠老将，不放心。依靠军队，又不行；依靠工人，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还不行。走马灯，恶性循环，他自己也收不了场。”¹

第三，是毛泽东在群众领袖（发动群众）与群众屠夫（镇压群众）之间搞平衡。如果说1966年6、7月间的第一次镇压群众高潮毛泽东以不在北京的方式避开了直接责任，那么从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签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其第一条规定，“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²）起，毛泽东的手上就沾满了造反派和其他群众的鲜血。毛泽东每发动一轮群众，随后必然会有一轮镇压。根据郑义、宋永毅的调查，1968年，在毛泽东签发关于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后，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广西军区调动军队，共杀了造反派和其他群众近20万人！仅仅宾阳县，在1968年7、8月的“红色风暴”期间，共有3,681人被枪杀、戳死、勒死、叉死、溺死、砸死，甚至活埋。³中共“九大”以后，镇压造反派群众，在群众中挖所谓“五一六分子”和其他“阶级敌人”，就成了运动的主要任务。

毛泽东的文革把“走资派”作为运动的主要对象，后者不甘于束手就擒，自然要进行抵抗。“走资派”的抵抗运动是反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官方的文革叙述全面肯定“走资派”的抵抗，这是错误的。“走资派”抵抗活动有好有坏，对于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时段来说，应当作出具体的评价。早期的抵抗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比赛革命”式的自保。在文革初期，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制造了一批“三家村”、“四家店”，以反右式

民文革”（二）》，载“罕见奇谈”论坛。

¹转引自《文革“红人”今安在？》，原载1996年5月26日《亚洲周刊》，载《华夏文摘增刊》，zk9607b。

²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223页。

³《宋永毅在芝加哥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会的演讲》；《专访郑义：广西大规模屠杀与吃人调查》；均载“大纪元”网站。

的“引蛇出洞”然后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传统“革命”方式来抵制（或者说干扰）毛泽东的新式“文化革命”。在这一阶段，刘少奇所说的“老革命”和“毛文革”是半斤八两，在揪人、整人游戏上只有层次的差异，没有性质的不同。进入文革高潮后，围绕着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问题，抵抗运动的意义开始凸显出来。尽管许多“走资派”是从关切自身既得利益出发来竭力保持现有秩序，但他们这样做，也有利于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与意愿。王希哲在文革中后期“越来越感觉到”一个事实：“人们对‘激进的革命者’林彪、中央文革的憎恨是远远高于对‘走资派’的憎恨的。”¹在没有认清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和真实面目之前，“走资派”所进行的抵抗是自发的抵抗，在被打倒后经过逆境中的反思，便萌生出自觉的抵抗。像胡耀邦这样的思想敏锐的“走资派”，到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仅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且已经认识到文革得以产生的体制根源和文化基因。²

把群众中的反抗运动放在最后来说，并不意味着它最不重要，这一运动无疑是反文革运动的主干。保守派、逍遥派、造反派，先后都成为反文革运动的参与者。但是，如果认为“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认为只要是以下犯上就具有政治正确性，就仍然没有走出文革式思维的陷阱。笔者把群众在文革中的种种表演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乘火打劫、落井下石。文革中发生了大量主要针对“21种人”、“走资派”、资本家、小业主和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打砸抢抄占”。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当权派转移运动方向的诡计，或者造反派有组织的罪恶行径，多数是群众中自发的出气和报复（有些是明显的个人报复，有些是所谓的“阶级报复”），是“勇敢分子”无耻的流氓行径和大胆的攫取行为。这种“阿Q革命”式的暴行，是国人缺乏法治观念（尤其是私法、民法观念）的劣根性表现，是不应当加以欣赏和肯定的。否则，就会倒退到黄巢、张献忠、义和团的水准，就会成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拥趸。

第二类是奉旨造反。这里所谓的奉旨，不仅包括“今上”的“最新最高指示”，也包括各级当权派的“矫旨”。所以，奉旨造反者不仅包括以青年为主体的造反派，也包括以工农为主体的保守派。不论是否抱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不论是否受过“走资派”的打压迫害，从根本上说，造反派都是实现中国最大当权派的文化战略部署的工具与傀儡，与省级以下当权派的工具与傀儡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造反派在文革结束后，被邓小平、陈云划为永不录用的“三种人”，当作毛文革的替罪羔羊。他们先是受骗，继而蒙冤，在长期被封口之后，近来刚刚有机会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心声。尽管可以有“同情的理解”，却不应当任意拔高和美化当年的造反派。即使是像杨曦光这样的佼佼者，当年对于毛文革的本质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却没有挣脱毛主义的思想枷锁。他们是纯正的毛主义者，即使反毛，

¹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记。

²参见曹志杰：《我为什么走向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回忆》中《我认识的“走资派”、“反革命”和“革命派”干部》一节，载陈子明等：《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香港：博志出版社，2006年版。

也是反对作为斯大林主义者和中共最高党魁的那半个毛，而不是反对毛的“珍贵思想”。郑义指出：利用皇帝反贪官，即利用现成的道统与法统反抗暴政，具有极大的合法性而不易招致立即镇压，容易形成声势浩大的规模，但无法摆脱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谎言已经成为“奉旨造反”合法性之依据。必然落入编织得十分严密的谎言之网。如果是不自觉地利用，就会束缚我们的思想，以谎言为真实，反而“弄假成真”，加强了谎言的欺骗性；即便是自觉地利用，也会使我们“作茧自缚”，在历史机遇真正到来之际难以超越既定的政治框架，提出更加深刻的民主诉求。¹

第三类是经济维权。芦笛认为，“‘经济主义妖风’是文革失控的另一种表现，在我看来也就是那场大革命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内容。”²经济维权运动主要发生在文革一头一尾。一头是在芦笛所谓“最进步的短暂时期”。荣转复军人，有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合同工临时工，是社会底层中最有凝聚力和能动性的团体，他们成立了全国性组织，并使之成为争取经济权益的压力集团，这正是典型的梁启超所谓“对内的”国民运动，也是国际上社会运动的常规模式。一尾是在文革后期和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这一运动获得了成功（实现了回城目标），但牺牲了一些运动的组织者（被逮捕判刑），从而也就长期埋没了群体性维权斗争、压力集团组织运作这样一些宝贵的国民运动经验。

第四类是政治抗议。这里所说的政治抗议，是在对毛文革和毛主义有了反思和觉悟后的意见表达，是一种自觉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这种抗议以遇罗克的《出身论》为早期代表，在中期分为政策批判和制度批判两个分支³。据赵诚说，在1974-1975年，山西省的一批前造反派成员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被官方破获后称为“张明、赵凤岐反革命集团”），集结了几百到上千人，他们反对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主张回归中共八大路线，属于上述的政策批判分支。⁴最后是到了1976年，零星和分散的抗议活动（大多数尚属于私下探讨和扩散，悄悄地制造舆论的阶段，少数已经进入秘密结社和有组织反抗的阶段），以悼念周恩来为契机，找到了一个突破和宣泄口，在天安门广场上演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群众性政治抗议运动。关于四五运动，请参见笔者专文《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载陈子明等：《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香港：星辉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

在笔者看来，只有第三类经济维权和第四类政治抗议，才可以算得上是群众反抗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五运动是群众反抗运动和“走资派”抵制运动暂时结盟的产物，而且还借助了毛泽东的平衡运动（他在1975年对江青等“文革派”的批评），因此可以说是反文革运动三个组成部分的大汇流。

十年文革的漫长游戏，足以消磨掉任何人的斗志和锐气。文革开始的时候，

¹郑义：《答毕时圆问，并提供造反派屠杀传统阶级敌人案例》，载“独立评论”论坛。

²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三）》。

³参见印红标：《“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与思想探索（1966-1976）》，第五章。

⁴参见郝建整理：《“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记录》，未刊稿。

毛泽东对于世界革命是何等的雄心万丈，到了尼克松访华时，他坦承“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革命口号是“放空炮”，他的影响力出不了长城，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¹。当毛泽东于1974年初制止江青“三箭齐发”开展反对“走后门”的运动，说什么“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²的时候，哪里还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的影子！“革命化”的毛泽东已经成为特权阶层“腐败化”的最大保护伞。

经历“游戏～被游戏”的十年，中国人尤其是原先的那一部分白相人也大大地改变了。文革结束后王若水对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研究，任晓町对于“人权”的呼唤，“伤痕文学”的崛起……都表明了人性的复归和觉醒。不是“人民文革”，而是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主墙运动，才是对于“人民政治大解放”的自觉探索。

五、文革启示：没有尽头的游戏

文革三十年周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想要让它脱离梦境——不论是噩梦还是美梦，进入文本阐释的层面，他们失败了——由钟沛璋任社长兼主编的《东方》杂志因为筹备出一期文革专刊而被取缔。到了文革四十年周年的今天，文革终于从梦呓进入到网络话语的层面，或者说语言游戏的层面，这是一件好事，是对于邓小平用“宜粗不宜细”、“不争论”封杀文革研究的一种突围。

但是笔者注意到，在目前对文革的回顾、反思与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是偏向于政治工程、革命战略、运动操作方面的“经世致用”之学，基于第二次文革正在酝酿、随时可能爆发的判断，急于总结和传播第一次文革的经验。其二是侧重于文化游戏、人生百态、伦理道德方面的“警世醒人”之学，以一种“端正人心，百年大计”的考虑，把文革作为一个人类病态的标本室、人性劣根性的展示台，把从世态（制度根源）人情（文化根源）的角度总结文革教训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与文化建设不能绕过的一个环节。

武振荣是前一种倾向的代表。他说：“‘文革’是我们中国人民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因此我能够做的工作是在1966年我们中国人民伟大政治运动的‘宝库’中寻找我们中国人民因为过去运用过、所以现在可以熟练运用之武器。”他特意“运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中引用的黑格尔的话，说历史一定会以两次形式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据此，武振荣“预言这个已经失败了的‘人民文革’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谁也‘阻止’不了‘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³

显然，武振荣在引用马克思语录时是凭记忆而没有核对原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原话是：“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

¹ 《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50页。《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50页。

²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88-489页。

³ 武振荣：《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2）》；《关于“21世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刘国凯〈论人民文革〉读后感（再续）》；载“独立评论”论坛。

世界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¹ “21世纪的文革”也是如此，“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只会成为“笑剧”和“漫画”。胡平讥讽说：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这些高呼“再来一次文革”的朋友们，就像一切想入非非的吃后悔药者一样，在他们关于再来一次文革的想象中，别人，尤其是他们的敌人和对手们，统统都照上次文革的老剧本原封不动、一字不差地重演一遍，而唯有他自己和他们的战友们却可以凭着事后的聪明作出大不相同的选择。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你有了后见之明，别人不也一样吗？可见，关于再来一次文革，关于再来一次文革我要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它们只是表达一种情绪而已。文革是空城计，只能玩一次，可一不可再。²

笔者在前面说过，文革的玩主，一是毛泽东，二是白相人。二者现在均已无法复制。王希哲针对武振荣“人民若不发动如‘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就解决不了问题”的说法，批注道：“这是武先生念兹在兹的理想。但‘文革’不是人民能发动的，只能是毛泽东能发动的，毛泽东不可能活过来。”³在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处于战略攻势的大背景下，挟中国长期国内战争胜利之余勇，手中握有总体性社会的全部资源，再加上一定程度的心理变态——毛泽东长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神经衰弱和轻微的精神病——才会有毛文革。即使毛泽东现在“活过来了”，没有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没有白相人的配合，他也掀不起风浪了。当年的白相人主要包括学生和青年工人。前者在上山下乡的艰难岁月中已经与“白相”绝缘。后者（主要是国营企业的青年工人）的“白相”心态或许保留得更为长久，但到现在也只剩下一些化石标本了。刘国凯说：“文革时期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在九十年代中期平均年龄五十岁出头，还保留着些许力量感，故喊出了再来一次文革就叫共产党完蛋的心声。至今十年又过去了。这一呼喊业已消沉。他们都年逾花甲，正在社会底层惶惶然地度过着他们生命最后的旅程。可信照此下去，不久这一呼喊就会在世上消声匿迹。”⁴21世纪的学生已经不是“精神贵族”，21世纪的青年工人也已经不是“城市贵族”，正如方圆等当年的合同工临时工更多地表现出经济人的一面，在中国市场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产生“吃饱了饭没事干，一天到晚搞文革”这种特殊类型白相人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

¹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603-606页。

²胡平：《还会再来一次文革吗？》载“观察”网站。

³《王希哲对“中国第二次文革”问答游戏部分来贴的批注》，载“多维博客”。

⁴刘国凯：《论人民文革——为文革四十周年而作》，载《北京之春》，2006年元月号。

从另一方面来说，经过四十年经验教训的启迪，中国的民众以及中国的民主人士对于人权、宪政、法治、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认识与觉悟早已今非昔比，还有什么必要再到文革的“武库”中去找寻思想武器呢？有了机关枪与迫击炮，还要关云长的大刀和张翼德的长矛干什么？如果需要挖掘革命的传统，古今中外正宗的革命有的是，为什么偏偏盯上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文革“伪革命”？如果要借用毛泽东的影响力，可以宣传《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毛泽东对宪政民主的呼唤，为什么偏要拿文革中的“假民主”（即“大民主～群众专政”）说事？原来，武振荣心中有很强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结。他说：“在‘民主’的本子中，没有‘人民是错误的’内容”，“民主的观点和民主的思想不可能认为人民是‘错误’的，不管是昨天的人民还是今天的人民——都是一理。”“民主的理论中必须假设在政治上人民知道爱谁？也知道恨谁？在这个问题上，人民不需要‘老师’教导他们爱谁？恨谁？怎样爱？怎样恨？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知识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这样‘教导’人们说，1966年的中国人民爱错了，也恨错了！鬼才相这一套呢？”1966年中国人民（武振荣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他个人的心情就可以代表全体的心情）确实恨过“走资派”，爱过毛泽东，这就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如果用人权、宪政一类的西方理念来挑剔和否定中国人民的“历史创举”，就是“选错了‘本子’”，就是“吃西餐，放洋屁”。“如果民运人士在民主上只会照着西方的‘本子’鹦鹉学舌，人家凭什么看得起我们呢？我认为在‘民主’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吃的‘西药’太多了”。¹主张“吃中药”，搞文革式民主的人，与主张“吃中餐”，搞中国特色专政的人，究竟谁才是毛主义的正宗传人？

主张弘扬文革经验者的论述方式仍然是文革中的基本套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彻底否定文革”是“邓小平圈套”。²“当今民间的文革反思实际上已经被中共牵着鼻子走。最典型的表现是中共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也高叫要‘彻底否定文革’。民间的‘彻底否定’客观上附和了共产党的政治谋略；自废了民众向共产党抗争的‘武功’。”³如果依法炮制的话，要废掉肯定文革论者的武功其实也很容易。在中共内部，现在已经出现了肯定毛泽东、肯定江青和张春桥、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而否定邓小平、否定华国锋投降路线、否定改革开放政策的争夺党内正统的派系。民间的肯定文革论者，是不是上了“邓力群圈套”，“客观上附和了”中共原教旨主义派系的政治谋略？

说邓小平和中共“彻底否定文革”，这本身就不是事实。迄今为止，官方对于文革究竟是否定得太彻底了，还是太不彻底了？他们封杀文革研究和媒体报道，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还是为了阻止“彻底否定文革”？最近，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再次重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

¹武振荣：《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或者以“文革”的话题谈民主》；《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2）》；《在“文革”问题上两种言论之分界》。

²武振荣：《与〈独立论坛〉网友谈“文革”（5）》

³刘国凯：《伪劣的文革史与误入歧途的文革反思》，载香港：《动向》，2006年5月号。

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¹这段话正是“不彻底否定”的一个标准样本。文革的领导者到底是犯了错还是犯了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和陈云都认为毛泽东在文革中有罪，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采用了上述说法，这是一个很大的倒退。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利用了林彪、江青（她自己说是毛泽东的一条狗），还是林彪、江青利用了毛泽东？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至今还藏着掖着，没有放到太阳底下来。文革首先是给党带来了灾难，还是归根结底是党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十年文革首先是十七年毛泽东路线，六十年列宁～斯大林体制的延续，还是其反动？对于意在“警世醒人”的文革研究者来说，恢复文革真相，彻底否定文革，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

如果不把文革视为“人民革命”，而是视为一场游戏，那么，就无须去预言未来的“第二次文革”，因为它已经在现实中粉墨登场了。“网络红卫兵”正在揭竿而起，文革腔调和作派正在重新走红，反资、反帝的仇恨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如果说文革是对革命与战争的模拟，网上文革就是对现实文革的模拟。双重模拟使得网上文革的游戏性质更加浓烈。

由于以下原因，人们对于网上文革的浩大声势不必过于紧张。首先，网络是一个E时代白相人麋集的地方，网上点击数根本代表不了真正的民意，就像文革中少数红卫兵的“打砸抢”代表不了中国大多数人的良知与行为方式（或者说，不能把红卫兵的反文化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其次，网上的人大多带着假面具，他的言语与行为方式有异于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语与行为方式；不少人选择了极端化的话语，有些人则是故意说反话。第三，网上君子不愿意与小人对骂，温和派往往选择当一个不发言的“看客”，狂热分子则大多是积极的行动者，是网上点击的功臣，就像“超女”的“粉丝”们那样，一个人可以顶一百个人。在这三重扭曲之外，还有一重更严重的扭曲：中国的网络并不是真正的自由空间，无所不在的权力黑手在幕后掌控着网络公司的删除键。“今日毛泽东”正在玩一种新的平衡运动，一方面是开足马力搞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资本～官家主义，一方面是放纵网上文革，让极左言论把水搅混，正所谓“打左灯，向右转”。

但是，网上文革的危害性仍然值得重视，它对于阶级仇恨、民族仇恨、地区仇恨、宗教仇恨的煽动，正在继续毒化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心灵。即使是武振荣这样对文革抱有好感的人也清楚地看到：“中国人心里正在面临‘毒化’的危险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民主化运动的前景也是很难看好的啊！”“假设人和社会的‘心理’有一个总量，那么仇恨的分量的不断加大的现象就有可能导致‘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高风险社会’尽管有许多的特征，人对人的仇恨可能是其中最显着的特征之一，因此我认为，若不用民主的方式疏导仇恨的情绪，以求最大限度的化解仇恨，社会被毁于仇恨火焰之中就是可以预测的问题了。”²

¹秋石：《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载北京：《求是》，2006年第10期。

²武振荣：《“巫毒娃娃”何以风靡中国？》，载“多维新闻网”网站。武振荣：《“巫毒娃娃”何以风靡中国？》，载“多维新闻网”网站。

游戏是人的天性。包括文革和网上文革这样的冒险游戏，都反映出人们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平淡的日常生活，要求变革社会，要求精神升华的理想主义冲动。鉴于游戏的虚拟、反讽、重构常常是孕育新文化的摇篮，我们不能单纯从它的功用和实效来评判其价值和意义。人类游戏的欲望是不可遏制、没有尽头的。20 世纪的大哲学家波普，给予了乌托邦主义以最致命的打击，却仍将自传命名为《无穷的探索》。笔者主张一种有节制的游戏观。在现代“高风险社会”，人们不能仅仅追求“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乐趣与刺激，还要随时警惕这种斗争可能带来的天灾人祸。避免和减少风险最起码的，就是要珍惜以往人类实验的教训，吸取经过长期历史检验的普世价值与全球经验，不走前人已经碰过壁的老路，不去“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

2006. 5. 31

【生逢乱世】

随时代风云变幻的学英语经历

华新民

按：本篇原标题为“英语改变我的人生”，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不久前，有一位网友写了篇学习英语的回忆。由此开头，好几位网友接二连三跟大家分享了自己学习英语的故事。看来，对身在海外的人，学习英语都是一段不能忘记的经历。这些故事不免勾起了我关于自己同英语之间结下的不解之缘的回忆，这一段缘份决定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我这里说的改变人生不是指学习英语对于升学、出国一般意义上的影响。而是指五十年之前国家采取的一项英语教育措施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事件波及到本人，使我走上一条独特的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相信这在同龄人中也是不多见的。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人到晚年，确实是回顾的时候了——

从初中不学外语到高中学英语

和大多数年轻的网友不同，我在 1956 年进初中的时候，没有外语课，全中国的初中都不设外语课，无论英语还是别的外语，都没有。当时我没有什么感觉，少一门课还不好吗？倒是家里的大人有些嘀咕，因为高我几届的邻居孩子都是初中就学英文的。不久前，我问了比我低几届的校友，才发现两三年以后，他们进初中的时候是有外语课的，不过大多是学俄语。这才意识到，我前后的几届学生恰好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初中没有外语课的时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不知道研究教育史的人有没有探讨过当时中国的教育当局为什么有如此决策。以我现在的回想，大概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正是中国执行学苏亲苏、反美仇美政策最高潮的时期，1957 年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说了一点美国的

好话，或者对苏联专家有些微词。显然英语这种“敌人的语言”是不适合在青少年中普及了，“老大哥”的语言才应该是第一外语。但是要在全国的中学里全部开俄语课，师资是个问题。当时，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刚刚实行了几年，学校里还没有培养出那么多俄语老师，于是干脆停了初中的外语课。直到1958年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和师范院校的俄语系终于培养了足够的俄语师资，才开始在初中恢复开设外语课。毕竟，外语还是需要的，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既然是武器，长矛不时行了，那就换成大刀。

所以，我的外语是从高中开始学的。不过，我进高中时学的却是英语。

大概是为了解决原来的英语教师的就业问题，教育当局将他们集中到少数几个学校教授英语课，其余的大多数学校则教授俄语。我“瞎猫撞上死老鼠”，进了一所教授英语的高中。记得当时的英语课还是比较重的，大概是为了弥补初中的缺课，同语文、数学一样，英语课几乎是天天都有的。不过我当时对数学、物理课的兴趣更大一点，开始阅读各种科学幻想小说和科普读物。当时有一套《趣味物理学》、《趣味几何学》和《趣味天文学》等适合中学生阅读的书，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另外还有一本名为《知识就是力量》的科普期刊，实际上是苏联同名刊物的中文译本，每一期都有苏联科学院这院士那院士的文章。这让我有点羡慕人家学俄语的同学，觉得要是学俄语的话，就可以直接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文章了。

进入大学后英语和俄语的位置颠倒过来

待到进了大学，就轮到学俄语的同学来羡慕我了。我是1962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的，学校的图书馆、资料室里的科技文献大部分都是英文的。学校的教授，严济慈、钱学森、郭永怀、华罗庚、贝时璋，哪个不是欧美回来的？苏联回来的教授一个也找不到。这才知道对于科学技术专业的学生，英语是遥遥领先的第一外语。入学第二年我们系有了第一届毕业生，被钱学森留在学校里多读了半年书，原因之一就是英语太差。这等于给全校各系各年级里学俄语的同学一个严重警告。

当时学校里学俄语的学生大大超过了学英语的学生，拿我们系我们年级来说，六十个同学里只有九个人是中学里学英语的，按十个人一组编组，我们九个人连一个小组都不够。系里把我们的学号编在全年级的最前边，让其余五十多个学俄语的同学隐约感到了“歧视”。每到上外语课的时候，我们九个人就在同学羡慕的眼光中去英语“快班”上课。因为每个系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是在中学里学英语的，所以这种“快班”要由三、四个系的同学凑合而成。当时学校的政策基本上是原来中学里学什么语言，进大学就继续学下去，只有少数系科允许从俄语改学英语，称为“慢班”，大概是因为这些专业完全没有俄语的文献。快慢之分明白显示那些学俄语的同学——用今天的话说——“输在了起跑线上”。

从中学到大学，英语和俄语的地位颠倒了过来，还同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就在我读中学的三、五年间，中苏两国共产党的争论由隐蔽转向公开。1960

年的时候，苏联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苏联已经不再是“老大哥”了，成了同帝国主义并列的“修正主义”，俄语的地位原来就是由政治原因支撑起来的，这时自然就一落千丈。想想中国当局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的中学里普及俄语教学，这期间费心费力培养新时代的俄语教师，淘汰和安置旧社会过来的英语教师，雷厉风行，效率不能说不高，成果不能说不大——有些网友的学英语回忆都提到在边远小城幸遇优秀的英语教师，大概也可以归功于这样的安置。到我们进大学的时候，我所在的科大力学系 62 级大体上是全国的一个缩影：80% 以上的中学生已经以俄语为第一外语，剩不到 20% 的英语学生全都来自上海、北京和江苏这三个地区，或许是因为这些地方“帝国主义残余影响”不易肃清。假如再接再厉，全国中学 100% 俄语化也是指日可待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风向掉了个头，英语教员又成了稀缺资源。当时科大的学生几乎全部都要求改学英语，那些欧美归国的教授大约也都有此要求，然而学校当局却只同意少数系科开设英语慢班，主要原因就是英语老师不足，俄语老师过剩。早几年要是知道有这样的局面，何必费心培养那么多俄语教师，又何必费心淘汰那么多英语教师？今天回顾往事，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折腾。这一折腾，浪费了多少教师的才智，耽误了多少学子的时光，似乎没有人算过这笔账。不过比起我们经历的那些更大的折腾，像土地分给农民后又收归集体、右派分子戴帽后又改正、私人企业国营后又重新扶植、人民公社建立又解散……这点小折腾实在微不足道。

我成了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生

不过对我本人来说，这个小小折腾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64 年秋天，我在力学系读书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当时学制是五年）。按规定，这是基础课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学完之后，就要分专业了。这时系里的领导找到我，向我提出了一个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光荣任务”——立即停止在力学系的学习，转到学校新成立的英语专修班全职学习英语，归外语教研室领导管理，准备毕业后留校当英语教师。

后来到了专修班，领导给我们这样解释事情的原委：1964 年 1 月份，戴高乐总统领导的法国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外交部预计今后几年内将有一系列国家跟进，甚至美国也在做这样的考虑。为此外交部门将需要大量英语人才，而前些年恰恰是英语教学受到严重削弱的时期。因此外交部向中央打了一个报告，提出今后几年内，包括师范院校在内的所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生统统归外交部分配，从事外交工作。至于当时各个高等院校也正处在第一外语由俄语向英语的转变之中，师资问题请自行解决，勿谓言之不预。

要是搁在民国时期，教育部长蔡元培或者那些很“牛”的大学校长胡适、刘文典、傅斯年大概不会买外交部的账。不过蒋南翔部长尽管打右派时毫不手软，对这种事却一点脾气都没有，要不怎么叫“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呢？于是教育部向全国各个高校发出通知，让它们利用自己的英语师资从在校学生中培养

英语教师。我们的英语专修班就是根据这个通知成立的。

我就是这样不幸“被光荣”了，毫无思想准备，从理科生一夜间转行成一个文科生，确实有一番犹豫和思想斗争——今天称为“纠结”。要知道，当时普遍重理轻文，一般只有数理化成绩差的学生才会报考文科。1962年的高考更是史无前例的严格和艰难，中国科技大学又是科学家的摇篮，在我们同学眼里，比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更胜一筹。想不通的是，我当初背井离乡、不远千里为考上科大而用功读书，最后却落得一个专修英语的下场！将来不理不文，专修班毕业算个什么学历呢？早知今日，还不如轻轻松松报考一个家乡的师范学院英语系，毕业时还算是正规的英语科班出身。但是现在“组织”找到你头上，如果拒绝“光荣”，即使继续在原来系科学习，留下“不服从组织安排”、“成名成家思想严重”——今天称为“追求自我实现”——的纪录，会有什么好的前途呢？

就在这重重“患得患失”的纠结中我接受了“组织”的安排。据说，当时学校要求二十多个学生改学英语，最后只有八个人同意进了我们的“英语专修班”，看来，“成名成家思想”比我严重的，还大有人在。

参加我们班学习的还有本校几个年轻的俄语老师。

英语专修班的老师

于是，1964年末，三年级的第一学期还没有结束，别的同学准备期末考试的时候，我就匆匆告别了那些复变函数和拉格朗日方程，开始了英语学习的第一课——正音。

原来学习英语的时候，只是为了阅读科技文献，完全没有考虑将来会有同外国人对话的可能，出国、留学更加属于异想天开，所以，没有人注意发音。现在要当教师了，要求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最初的一两个月里，我们的重点放在纠正以前的不正确发音，课上朗读葆青编译的《英语口语日常用句》，课后抱着笨重的录音机听“灵格风”。老师是从外语学院调来的刘新。刘老师眼睛不好，几乎半盲，上课时提一个暖瓶，随时喝水润喉，半闭着眼陶醉在自己柔和的伦敦口音中，我们则看着他的嘴形跟着念课文。有时也练一些绕口令：“She sells sea shells”，“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从那时开始，直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一年半的时间，除假期和短暂的下乡劳动，我们专修班的同学每天都十几小时沉浸在英语学习中。学习的课程除语音以外，还有阅读（又分泛读和精读）、语法和口语。这段时间的高强度英语学习，使我们的英语水平确实有很大提高。

这不能不归功于教我们的那些老师们。由于是培养自己的教员，学校给我们配备了最好的教师。语法课由教研室主任田雨三先生执教。田老先生是延安来的老革命，但是外表完全是一个老学究的样子，也从来不提他的革命资历。他是河南人，口音浓重，他跟我们说：“我讲英文的时候，谁都不懂：中国人以为我在讲英文，外国人以为我在讲中文。”他的专长是语法，用一本原版的英文语法教科书给我们上课。他最推崇的语法学家是丹麦人叶斯珀森（Otto Jespersen），引

用的文句常常出自作家艾略特 (George Eliot) 的《织工马南传》(Silas Marner: The Weaver of Raveloe) 和一位归化为日本人的欧洲人小泉八云的作品。当时市面上流行的英语教科书多采用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的作品片断作为课文, 认为他们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 具有进步性——天知道这种阶级分析法来自哪里, 多半也是从苏联那里沿袭来的吧。田老先生不理睬这种“政治正确性”, 这或许是因为个人的偏好, 或许是因为他本人在“旧社会”就是接受这样的英语教育, 艾略特和小泉八云是当时主流的英语教材, 他只是把他认为最好的英语典范传授给我们。

我们的阅读课主要由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孙瑞禾先生讲授, 他最推崇的英语权威是复旦大学的葛传槩教授, 对他的《惯用法词典》和自学成材经历津津乐道。孙老师讲课时解释词汇适用的场景, 有时配以动作, 十分生动, 对我们的阅读理解能力提高极有帮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著《我为什么在七十二岁的时候来到中国》一书最早就是他翻译为中文的。文革后还出版了他翻译的名著《简·爱》和许多关于英语教育的论著。其中一本《常用汉语虚词英译》其实在教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雏形, 他把有关讲义发给我们的时候一再关照这是他的“独门秘笈”, 只对我们倾囊相授, 但不要外泄。讲义中提出的问题是: 汉语中有一些加强语气或表达强烈情感的虚词, 英语中没有这类词汇, 那么英语如何来表达这类语气和情感呢? 举个例子说, “约翰逊没有料到, 竟然是肯尼迪把 (民主党总统) 候选人的资格从他手里夺走了。”这句话里虚词“竟然”被用来加强“没有料到”一词的语气, 表示约翰逊原来认为肯尼迪是最无竞争力的一个对手。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竟然”这个意思, 孙老师认为, 这里可以用“of all people”这样的词组来表达: “Johnson never expected that Kennedy, of all people, could take the candidacy from him.”按字面翻译的话是: 约翰逊数遍了所有人也没有料到肯尼迪会赢他, 这就把“竟然”、“居然”、“偏偏”这样的意思表达出来了。

我们的口语老师是著名力学家郭永怀的夫人李佩, 她是教研室里唯一在欧美长期生活过的人, 待人和气, 教书认真。有时她还编排一些“小品”让我们练习对话。当时为了提高听和说的能力, 我们也听英语广播, 不过“敌台”是不能听的, 只能听我国对外广播 Radio Peking。另外还有一些英语电影, 不是英美制作的原版电影, 而是我国自己译制的对外宣传影片, 如替我国民族政策辩护的《农奴》和《天山上的红花》等, 可以想象, 这些广播和电影充满了政治词汇和“中国特色”的英语。李老师不同, 由于她本人在国外的经历, 所教的口语更贴近外国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真实使用的语言。

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接触真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 记得学校还曾设法安排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科学家的夫人来给我们上课。当时来访的外国科学家很少, 来自西方国家的尤其少见。这位科学家夫人的弟弟是澳大利亚共产党 (马列) 的主席希尔, 现在很少人知道他了, 需要作一点说明——当时中苏两党的争论已经公开化, 世界各国共产党大多站在苏共一边, 也有少数人从其中分裂出来, 成立“马列主义共产党”, 在自己的共产党名称后加一个括弧“(马列)”, 以示区别于

“修正主义”的正统共产党。希尔大概是这类“马列主义共产党”中最坚定的一位，每年都要来中国几次，每次来访都出现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接待规格同外国的领导人访华一样，从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大概是受到希尔的影响，他的姐姐和姐夫决定来中国做较长时间的访问，由科学院负责接待。科大属科学院领导，而科学家的夫人也提出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正好可以安排她来给我们上英语课。我们从来没有同外国人接触过，对此十分期待。

然而最后还是落空了。不是别的原因，而是——文化大革命来临了。

当大象晃动鼻子之后

如果说从力学改行到英语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急转弯的话，文革的爆发让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第二次急转弯。文革的经历不在此细说了。总而言之，从1966年6月初开始，全国所有学校的课程都停了，我们的英语课也停了。本来，由于英语教师的紧缺，教研室的领导已经决定让我在1966年夏天提前一年毕业，以便在秋天开学的时候可以上岗教书。假如文革没有发生，那我就可能在一个多月后，成为中国科大的一名新出炉的英语教师，并从此“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终老于北京八宝山旁边的科大校园，眼看着原来的同学们成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骨干，心里或许还会带点儿“羡慕嫉妒恨”的醋意。

历史没有假如。文革不仅打断了我的英语学习，也打断了我原来力学系同学和全中国所有在校学生的学业。于是到1968年毕业分配的时候（因为文革，推迟一年毕业），本来似乎已经注定要当教师的我们又面临了何去何从的问题。原因是文革不仅中断了所有学生的学习，也中断了中国的外交进程，似乎没有多少国家急于同中国建交——英国的代办处都给烧了。英语人才的需求也不那么紧迫了。至于学校，连要不要办下去都是个问题，有谁还关心是不是要开英语课？又有谁还需要我们这几个半路出家、半生不熟的候补英语教师呢？

面临不确定前途，各个学校的英语专修班同学于是按照文化革命所提倡的“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串联起来到教育部去“造反”，控诉开设英语专修班是教育部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结果，要求“解散英语班，彻底闹革命”。教育部这时泥菩萨过江，也没有人在乎这么一小撮人的前途，就同意了造反者的要求：解散英语专修班，各自回原来系科参加分配。

就这样，我的人生在两个急转弯之后表面上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同学中。回顾分别的这段时间里，我的那些老同学们在我离开力学系不久，就中断了专业课程，到北京郊区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直到文革爆发——因为伟大领袖说，参加阶级斗争是大学学生的“主课”，不上不能毕业。跟他们比起来，我错过了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掌握了一门敌人使用的语言，“人生斗争的武器”。

1968年离开学校后的几年里，经历了云南边疆军队农场的“再教育”，我被分配到昆明钢铁厂当了一名烧锅炉工人。这期间我都按毕业证书上写的力学专业向单位报到，除了信得过的朋友，尽量避免告诉人家专修过英语的经历，一是为

了减少“偷听敌台”的嫌疑；二是怕厂里把我分配到子弟学校去教英语——文革中教师受到学生批斗的遭遇使人人将任教视为畏途。再说，英语在农场和工厂里除了教书也确实没有什么用处。

事实上，力学专业也同样没有用武之地，“夹紧尾巴做人”才是我们知识分子的本分。如果从1966年文革爆发算起，整整七年时间，我几乎没有再碰过书本——无论是科学还是英文的。不过到第七个年头时，我的人生道路又发生了一个转折，这一次竟然还是同英语有极大关系。

跟第一次一样，转折是从与本人毫不相干的事件开始的：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文革已成强弩之末，工厂的生产逐渐走上正轨，当时工厂还是由军队干部掌权，不过也开始重视提高产品质量以及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据说在一次研究提高我厂钢铁产品质量的会议上，厂里的一些技术人员向省里的军代表提出了购买质量检验仪器的建议，我们厂是云南省数一数二的企业，军代表很大方，请技术人员把需要购买的仪器开列出来。出于我至今也不明白的原因和心理，那些技术人员在清单中提出要从日本进口“扫描电子显微镜”。其实，钢铁企业作日常产品检验，金相显微镜足矣，完全没有必要用这样高档的科研仪器，当时全国的研究机构也没有几家有这样的仪器。可是省里的军代表居然同意了，可能是把它错当成了平常医院里见到的显微镜同一类的东西。等到发现这玩意儿那么昂贵，全省一年的外汇指标都不够买一台时，才知道被“臭老九”忽悠了。只好硬着头皮，挪用下一年度的外汇，把它买了进来。

成套设备到了厂里，才发现它只有日文和英文的说明书，没有人知道如何安装和使用。厂里唯一的一位有相当英语水平的人是民国时期公派到美国实习的“海归”工程师，因为“特嫌”的原因，还在“学习班”里接受审查。厂里只好临时将我们这些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找去，询问有谁能胜任翻译这些说明书的工作。没有想到，我这个半路出家、半文半理的人在这里显示了“杂交优势”：我的英语比一般的理工科大学生好一些，另一方面，那些物理和电子光学的原理和术语让文科生头痛，对我却没有困难。

以上所说只是我的人生道路发生改变的“微观”原因，直接听说或者从当时的经历中感受到的。现在翻阅那几年的历史，发现它也许还有“宏观”的原因。那就是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全面主持政府工作，他的决策之一就是国外进口一批工业设备。当时广为人知的是进口了几套化纤制造厂设备，以解决国内棉花产量不能满足人民穿衣需求的问题，“的确良”等化纤产品就是从那时开始在中国普及的。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中日邦交的建立也在那个时期发生，为进口成套设备提供了可行性。于是，史册记载，在1972年后形成了一个进口工业设备的小高潮。很可能当时各个省都获得一些进口工业设备的外汇，这些钱不用白不用，到了云南省就被掌权的军人们用来优惠几个大企业了。回想起来，当时我所在的钢铁厂进口电子显微镜，也应当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生的。

同第一次一样，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通过一种无法预知的方式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第一次是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内的一个决定，这一次是周恩来

总理在中南海里的一个决定。现在人们常说，亚马逊丛林里的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就在地球另一边的太平洋上掀起了一场风暴。说的是，一个微小的扰动会触发复杂动力学系统的不可预知的巨大变化。套用到本人的经历来说，戴高乐、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在世界政治丛林中可不是小蝴蝶，算得上是大象级别吧。是不是可以这样比喻：大象晃动了一下鼻子，就在太平洋上掀起了一场风暴，这风暴中的一朵小浪花，把几个小鱼和虾米永远冲离了原来的觅食路径，我就是其中的一只虾米。

于是在1973年，我这只虾米就从车间调到总厂技术处，担任专职的科技情报翻译。

同第一次从专攻力学转为专修英语时不一样，那一次是勉为其难，这一次是欣然赴任。因为经过这八九年间的动荡，社会环境和个人境遇有了很大不同：第一次是全国一流大学的学生，本来有希望成为航空航天专家，却从那个“两弹一星”的接班人队伍里被拽了出来。这一次是边远工厂里的锅炉工，背着“臭老九”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包袱，看不到什么前途。另一方面，目睹当时出现不久的工农兵大学生基础太差，不堪造就，这种局面似乎看不到终结的日子，不免觉得自己这一代人，虽然大学的学业被文革打断，若干年后或许就是中国最后一代还懂得微积分、读过莎士比亚的人了。从而相信自己的英语和科学知识，尽管只有大学里的基础水平，终有一天会有派上用场的机会。

没有想到，大象鼻子的晃动，加上军代表被几个别有用心的“臭老九”一忽悠，机会就这么早早降临到了我头上。

神秘的“光华出版社”

虽大学里的那些课程已经荒废了七八年，又没有什么工作经验，靠着四年文理两方面的训练，尤其那一年半时间的高强度英语学习打下的基础，我就这样干起技术翻译来。那位海归工程师在经过一段时间隔离审查后，也被释放回家，但是属于“控制使用”，被分配来同我一起做科技情报的翻译工作。他对于钢铁生产业务的熟悉，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们一老一少两人，从事领导看不懂的业务，除了同技术人员往来，没有人检查我们的工作，竟有点像生活在世外桃源中一般。在那些年里，我们除了翻译电子显微镜的说明书，帮助实验室的人员安装和调试以外，还负责厂里其他同外语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翻译各种进口设备的说明书（大到运输矿石的重型卡车，小到厂医院里的牙科设备），以及根据各车间技术人员的要求，帮助查找和翻译有关的外文资料。

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美好时光，有几件事不能不提：

我接管了文革前厂里的科技资料库，惊奇地发现了一批英语和日语科技资料，从文革开始大约已经尘封了七八年，杂乱地堆放在一间小屋子内。这些资料大部分是1967年之前大约十年时间内的外国科技期刊，由一家名为“光华出版社”的神秘机构影印出版。后来了解到，民国时期确有一家私人办的“光华出版社”，1949年后就消失了，实际上是搬到北京，成了内部机构，专门从事发行影

印外国书刊的工作。当时全国的科研机构、企业和学校，都没有订阅外国刊物的外汇和权利，所有中国需要的外国书刊，都由“光华出版社”对外订购少数几本原版，然后大量影印供国内读者使用。这种做法当然是无视“知识产权”的行为，不过在那个年代，对于中国的有关人员了解国际科技发展动态还是有着正面的作用。我发现，文革开始后不到一年，所有期刊干脆都中断了，也许是厂里没有人去订购了。也有可能是光华出版社停止出版了——有那么几年连国内的学术刊物也都全部“停刊闹革命”了，光华停业也不算奇怪。

到我开始在技术处工作的时候，光华出版社也逐步恢复了业务，每年年底，就会寄来一本征订目录，厂里每年给我们一千元限额，可以订阅几十种期刊书籍。此时就由我和老工程师二人一起确定订阅的书刊名单，大部分当然是跟生产有关的采矿、冶金、机械、炼焦刊物，也有一些学术性高的刊物如晶体学报，金属学报之类，也有动态性的刊物，如“Science News”和一些学术团体的会刊，以及科普性的刊物如“Popular Science”和“Scientific American”等。反正领导也看不懂那些名称，完全是我们说了算。这些刊物，每隔几天就会从邮局成包送过来，成了我天天阅读的材料。除了从事翻译任务以外，工作之余也会浏览一下各种科技新闻。由于个人的基础知识所限和兴趣爱好所致，美国物理学会会刊《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和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是我经常阅读的刊物，有时还到库房中查找旧刊来读。它们为我打开了一扇前所未有的窗口，猛然发现，就在我国人民——包括自己在内——紧跟伟大领袖一心一意闹革命的那些年里，世界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许多进展，可以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例如“夸克”粒子的理论就是在文革爆发前两年的1964年提出来的，1968年夸克就在实验中发现了，使得物理学家对物质结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反观我们自己，1964年，我的同学们——不管是学火箭导弹，还是学基本粒子的——统统被送到农村上“阶级斗争”的主课去了，我因为学英语得以幸免。而到1968年，中国的所有大学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招生，我和同学们则被分配到工厂、农村和部队“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我们订阅的影印刊物当然都是科技资料，没有什么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内容。在这方面，出版者是小心把关的。我在阅读那些旧刊时注意到，光华出版社的出版物在文革之前随着形势日益严峻，有一些醒目的变化：早期的影印刊物还算完整，只是彩色图像都印成了黑白图像。后来那些插在期刊中的广告照片——免不了有风景和男女人像——都不印了，留下一块块空白。再往后，所有的插入广告全都成了空白，只剩下科技文章的正文，这时已经接近文革了。

即使是这样严密，有时也能读到一些科技以外的内容。例如在六十年代的一份物理学会的会刊中，我看到一则杨振宁到纽约州立大学任教的消息。其中说当时的纽约州长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后来当过福特的副总统）在竞选时承诺，要把纽约的州立大学办得跟加州大学一样好，所以在他上任后，以全纽约州政府雇员的最高薪水聘请杨振宁到纽约州立大学的石溪分校任教授。这一类的报道对于今天的中国公众来说也许习以为常，但是当时对于只知道“调动工作要

经组织批准”、正在为解决“夫妻两地分居”而找门路的我来说，则是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办大学的，还有这样换工作的！

当我把这条消息告诉老工程师时，他笑笑说：“我们国家解放前也是这样的。”

从 1973 到 1978 年，我天天同英文打交道，阅读和翻译这些影印的外文书刊。回想起来，这五年时间对我后来的人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让我在荒废了七年的学业之后又回到了学习的轨道上，使我在那个“读书无用”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难得地获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又有机会在中国的边陲地区接触到世界上最新的科技进展，仿佛虾米漂泊到一个食物丰富的小海湾。尤其重要的是，我在这几年时间里，拣起了已经丢掉了七年的功课，包括在大学里头两年半的科学基础和后一年半的英语，还直接用英文书本自修了一些物理学和电子光学的课程。同时我还学会了阅读日文资料，因为厂里的进口设备，从电子显微镜到“五十铃”卡车，都来自日本，而且当时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之一，有着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企业。日文的科技资料，三分之一汉字，三分之一是片假名拼写的英文字，只有余下的三分之一要花点功夫学习，相对来说容易掌握。不过自从 1978 年离开了那个工作岗位，日文再也没有用过，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然而其他方面学到的东西，却让我此后的人生受益无穷。

值得记下来的接待外宾轶事

由于我在工作之余还为重庆科技情报研究所出版的《科学》（最初是《科学美国人》的中文版）翻译了若干篇文章，并为科大老师编辑的《现代物理学参考资料》担任翻译和校对，从而使我同母校恢复了学术上的联系。当 1978 年来临的时候，恢复了高考招生的科大亟需各个科目的教师——学校在 1969 年搬迁到安徽的过程中流失了许多教师——就把我调回了学校作物理教师。

1978 年秋天，我回到了阔别十年、“人是物非”的母校——老师和考回学校的研究生中有许多熟悉的面孔，校园景象却完全变了——从北京的西郊搬到了陌生的合肥市。

我虽然是在物理教研室教书，仍然剪不断同英语的关系，时常被拉差去从事同英语有关的事情。那个时候西方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开始多起来，而由于五十年代中国教育界的全面俄语化和文革期间教育的中断，教师学生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听懂他们的学术报告和讲座，需要现场翻译，而外语教研室的老师又不懂起码的科技词汇和概念，不愿意在这种场合难堪和闹笑话，于是为来访的科学家担任翻译成了我的一项经常性任务。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为一位来自西德慕尼黑的天体物理学家当翻译，不仅为他讲课时作口译，还为他游览黄山作翻译兼陪同。那已是 1980 年秋天的事，当时对于外宾的接待政府有一套非常详细的规定，还是更早的年代留下来的。这里写下我本人所感受到的那些规矩，晒一晒那个时代国门欲开未开的尴尬，为历史记录下一点可作谈资的“轶事”。

首先，科学家未到，上面就有内部文件到了，我没有见到过文件本身，但是

领导在交代我翻译和陪同任务时会提到一些文件内容。其中有关于这位科学家的介绍，学术地位和职务，国际影响等等。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文件规定了他到安徽后的接待规格——住什么样的宾馆、日常伙食标准是什么级别、有几次宴请、宴请时我们由什么级别的官员陪同：系主任级、副校长级还是校长甚至省里的高干，什么级别的教师可以出席宴会，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所谓“外交无小事”嘛。后来我陪同他前往黄山，学校派小车送我们过去，省里又有文件下达沿途停留的各地，如中午到芜湖过长江，之前在哪家宾馆招待午饭，伙食标准几何，夜间留宿黄山哪家宾馆，都已安排妥当。我们的小车开进芜湖的宾馆，他们看见车到，也不“验明正身”，就上菜招待，吃完后上路，也不用付账——那个时候，凡是坐小车的人，都有一定的级别，都由单位事先作好安排。

那位德国科学家当然是不知道的，只是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招待。

到了黄山下榻宾馆，他终于发现了问题，问我们陪同和司机为什么不同他住一个旅馆？我们不得不如实相告：我们的级别不够，不能跟他住一样的宾馆。同样是文件规定，我们陪同在路上可以“沾光”，同客人在一桌用餐，到达目的地后就不能享受这样的超规格待遇了，客人的饭菜标准有文件规定，我们只能吃普通的客饭。所以他只能独自一人享受大餐，即使在同一餐厅，我们也只能在另外的饭桌上互相遥望着用餐。这让这位来自资本主义德国的科学家见识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只觉得不可思议，一点也没有荣耀感，反而十分不自在。

不过除此之外，他的旅行还是十分愉快。当时已是11月份，山上已经下雪，我们替他雇了一个当地的老乡给他背成套的照相器材，他走遍各个景点，拍了很多黄山雪景。他回国后给我来信，说他的黄山游记和照片刊登在德国的旅游杂志上，是当年最佳风景照片。他是游览黄山的第一个德国人，在旅游界也成了名人。

当时学校有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我刚刚回到学校，虽然算是物理教师，不是科班出身，没有上过物理系的课，力学系的课也没有学完。半文半理，不文不理，始终是我自己的心病，所以不好意思争取这样的出国名额。终于1980年有了留美物理学研究生考试的机会，可自由报名，我贸然报名参加考试侥幸得中，在1981年来到美国重新开始学生的生活。（那次考试的英语考题，of all people，是李佩老师出的。）此时离开我扔下书本，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投入文化大革命已经整整15年了。如果从当年在大学里由理科生一夜之间变为文科生算起，再到美国又成了一个理科学子，则经历了17年的光阴。其间几经曲折，除了文革的爆发，每次曲折都同英语脱不开干系——先是因为“国家需要”，被动地从理科生转为专修英语的文科生，后来又借助英语的优势，主动争取从事翻译工作，开通了回归自然科学的学习道路。

从我对于科学的向往和追求的角度来看，说得上是“败也英语，成也英语”。假如早知道英语的学习对我后来大有帮助，当初何必那么纠结？再一想，假如不是文革的爆发，我又有何可能离开原已注定的英语教师的职业？可是再一想，假如不是那台进口电子显微镜，我又怎么可能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从而在十几年后来到海外回归自然科学？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世事难料，人生无常。诚哉斯言！

2013年12月16日定稿

【书海泛舟】

疯狂红海洋里的小小浪花

——黄荣华《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序

赵晓铃

按：《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八一五派代表黄荣华自述》，黄荣华回忆、何蜀整理。2013年12月由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

和那些高层的文革风云人物的回忆相比，黄荣华的自述或许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业绩，更是升斗百姓的日常生活，后者往往是更为本质的历史图画。

黄荣华经历的文革是完整的，不光是打打杀杀、批斗会、学习班，还有当时的社会时尚，人们的柴米油盐，那些生动的生活细节，是研究那一段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给后人以对那个时代的感性认知。经济濒临崩溃，职工十数年不涨工资，人们长期缺吃少穿，粮票肉票布票烟票……学校不上课，电影院戏院关闭，没有艺术，没有书籍，没有正常的娱乐，只有极为单调狂热的红歌红舞，知识青年被送到偏僻的农村，骨肉分离，社会混乱，交通不便……高层的领袖们，或许与这些关系不大，然而，中国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他们不在台上挥手，也**多**不在台前低头弯腰，可正是他们，承受了这一场浩劫的政治、经济、文化后果。如果没有这一切，何以将文革称之为浩劫呢？

本书特别引人深思的，应该是文革造反派的命运和感受。

文革造反派，包括红卫兵们，都是疯狂的红海洋里的小小浪花，在运动的大潮中被发动起来，一时间被高高抛起，身不由主地冲锋陷阵，甚至有过炫目的光斑，但转瞬又从高处摔下，跌得粉身碎骨！

浪花在大海中的起落自己是不能选择的，还必须承受风暴造成的后果，造反派在运动的中、后期和运动结束以后，被视为动乱的祸因，替运动的发动者背上黑锅，未获刑事惩处的，也受到反复的精神折磨。对于他们来说，文革不止是十



年，好些人的厄运甚至是终身的。当然，这还得有个前提：如果他们幸存的话。这个黑锅，他们至今没有卸下。经历过文革和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造反派形象，全是凶狠野蛮的，或是下流无耻的。这说明，当年黄荣华在北京学习班里听到的中央首长对造反派的批判，仍然有效；而造成巨大灾难的运动发动者，也仍然被尊为圣上。

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读者仍然能从书中难免带着辩诬意味的文字中，感觉到黄荣华因此而受到的巨大伤害。

黄荣华回忆了自己从一个普通青年工人，被推举为工人造反派组织的一个头头，又进入市革命委员会做委员的前因后果以及心路历程。她写得很细，很生动，她或许没有想到，放在那些大量的文革受害人的回忆中，她这位来自底层的“造反派头头”的经历，不光让读者重温那个时代的荒谬与疯狂，还是一面让许多过来人无法回避的镜子——那样的被运动，被裹挟，被欺骗，像风暴中被卷起的微尘，不知会飘向何处，又能在何处落定，却带着颠狂的热情，承受着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为沉痛的，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失落。

如果黄荣华这样纯朴胆小勤劳孝顺的母亲的乖乖女，都被推举为造反派头头，都能在武斗时去服务，能在批判会上，在学习班里，在宣讲会上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违心的谎言，那么，还有什么人不能被驱赶进“其乐无穷”的人与人相残相折磨的角斗场呢？过来人都知道，那时候，人们不在台上就在台下，不是被别人批斗打倒，就是去批斗打倒别人，哪怕是天大的谎言，只要来自最高领袖或是“中央”，便以为天经地义，大家跟着撒谎，并不以为可耻。很少有人能置身事外，尤其是有单位，在单位里领取工资的人们，不但不能选择，而且无处逃遁。

黄荣华是从文革前好几年写起的。她描绘了失去父亲以后，她和母亲、妹妹一贫如洗的生活状况，瘦弱的小姐姐在风雨中背着更瘦弱的妹妹，饥肠辘辘的同学们，穿着女孩子衣服被饿死的小男生，不得不辍学以后的痛哭，吃力地挑担子的小姑娘，加工厂里比她家更加困难的大婶阿姨……那样可怕的贫困，那些无法想象的细节，今天的人们读起来会非常震撼，但过来人都知道，那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不应该忘记的历史。在本书中，这都不是闲笔。

那时候，黄荣华不会想到，在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什么对孤儿寡母没有必要的抚恤与照顾？她所有的只有感激：收到五元钱助学金后感恩不尽，得到一份工作后感激涕零，为获准少交三元钱学习班伙食费而长久地铭记周恩来的恩情……

正是贫困使她十六岁就退学，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无法选择，参加工作，她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选择。她后来跟随时代潮流，参加文革运动，做造反派的“常委”，做革委会的委员，仍然没有选择。在人生的每一个关口，她不能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而会考虑母亲的要求，当然，首先是要服从领导，尤其服从来自最高领袖的号召。“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为了那些指向，无论是多么不理解的荒谬的指向，心里多么不情愿，她仍然可以放下家事，违背常识（那是她的母亲，一位不识字、没有工

作的家庭妇女都明白的常识)，甚至可以牺牲爱情。

这不仅是黄荣华，而且是我们一代人从小就习惯了的思维定势。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成“驯服工具”，被当成“螺丝钉”，不是会思考、更不是人格独立的人！我们长期被豢养，就像奥威尔在《动物农庄》里写到的那些小狗，生下来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被训练成为无限忠于“拿破仑同志”的凶狠打手；就像绝对忠于皇上，全无思想头脑、甚至没有亲情爱情的“血滴子”。更何况，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制度，是人们完全没有自我选择的生存状态的基础——越有经济保障，哪怕是极低的保障，也越是必须服从。黄荣华亲眼目睹了多少因为不服从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实例，她哪里敢因为自己内心的呼唤而用母亲、妹妹和自己最起码的生活保障来冒险！

1956 年对私改造完成，中国的计划经济全面推行，自此，国营经济绝对主导了国家命脉，也主导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进了国企，就终身有靠，国企成为青年们寻工作与找对象的最佳选择。至于人格、思想与个性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样的束缚甚至摧残，就顾不得了。这就是哈耶克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二十多年前就指出的：通往奴役之路。伟大的思想家早就预言了黄荣华一代会有一段完全不能选择的青春年华。

本书中关于爱情的向往与婚恋的记录，会让过来人不胜唏嘘，而后来人会难以置信。一次又一次，爱情之花尚未绽放，便被世俗与权力碾碎，或由于无法预测的命运而不敢选择爱人。可堪庆幸的是，作者在运动结束以后，还没有失去爱的能力。只是，她保留在心中的那一点点美好记忆在数十年后还是那么清晰，在她一次又一次的讲述中，读者应该能够感觉到，对于自己无花的青春，作者的遗憾是很深的。

我相信，读到本书的读者都会感谢黄荣华以认真的回忆、诚实的记录，留下可贵的历史图画，给同代人打开回忆之门，引起有益的反思，尽管这样的反思有些沉重，甚至苦涩，却是无法回避的。而年轻的读者会更加明白，自我选择是对人生最起码的珍重。

2013 年 5 月 8 日

【书海泛舟】

《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前言

黄荣华

已经记不起是第几次校改完这部书稿了，几年来的心力投入总算告一段落，如释重负之余，还有些话想说说。

我要感谢重庆市经委的好友唐金玉。是她开导我接受一个刚刚“改正”的“右派”做丈夫，她的劝告真是金玉良言，成全了两个饱受政治斗争伤害的苦命人有

了家。我们互相帮助，相互扶持，过得很好。

我要感谢我的丈夫罗老兄，他以他从惨痛的生活经历中所感悟到的许多真知灼见开导了我，使我能摆脱长期接受的许多假、大、空的宣传教育和个人迷信的影响，对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能有一个清醒的反思。

我还要感谢研究文革的何蜀先生不辞辛劳，鼓励我写出这部回忆录，并热心帮助我整理书稿。可以说他是很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他的行动是大义之举，他抢救的是将要消亡的真相。老实说，多年来我很混沌迷茫，总想遗忘痛苦的过去，任由别人去对我们这些文革造反派瞎编乱说，“眼不见为净”。何蜀的劝说、鼓励，启发、触动了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开始回忆并反思、反省十年文革中自己的所作所为，回顾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一字一句地写出来，最初是用笔写，后来又学会了用电脑写，断断续续，写写停停，改了又改，总算积存起了这样一部书稿。

文革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当年的疯狂、恐怖、暴烈、残酷、滑稽……还是让不少的过来人想起就惊心动魄，记忆犹新。亲历者能实事求是把自己的文革经历记录下来，对现在和今后的人们真实全面地了解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吸取历史的教训，开创新的生活，是很有益处的。

我的回忆录是尽最大努力实话实说。由于时间久远，难度相当大，想寻求别的知情者帮助回忆又屡屡遭拒。有的当事人离世了；有的当事人不愿意回忆伤心的往事；有的当事人文革中做过伤害他人的事感到内疚，不想再提及；有的则担心写出当年的历史会不会再遭到谴责和清算……对十年文革他们选择沉默、遗忘，也情有可原，毕竟都是古稀之年甚至年龄更高的人，经不起折腾，想活得轻松、快乐、安宁一点。所以我很难求得当年“战友”的帮助，以充实完善我的书稿。加之我写作水平有限，故缺点、差错难免，希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我想向文革中造反派掌权期间我们工厂里受迫害的人说声“对不起”，我虽没有参加过抄家、武斗、整人，没有直接伤害过任何人，但我参加了造反组织，还当了头头，在我们一派组织控制厂里局势期间，我是分管后勤的总部常委，虽然对有些决策我并不赞同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比如将厂里生产的子弹发送给同一派的其他组织），但我知道后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在北京参加中央学习班回厂后，被市领导安排去宣传“八一五会议”精神，我根据上级的要求极力宣传个人崇拜，愚弄群众，为疯狂的文革摇旗呐喊，添柴助火，所起的作用都是负面的。至今想起来还感到荒唐和羞愧。

而今，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当年那三个曾与我“通信恋爱”，差点就同我走到一起的人能读到我的这本书，了解我当年的思想状况和处境，了解我与他们分手的不得已的苦衷。为我当年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好想真心诚意地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但愿那样荒唐的可诅咒的年代不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2013年4月17日

《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整理后记

何 蜀

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据我了解，主要有这样三种类型：一是因受到压制打击而起来反抗以争得公平正义的人，或可称为“抗争型”；一是因长期所受的革命教育而积极响应号召投身革命的人，或可称为“理想型”；一是因见到时局有利于个人一展身手而想为自己捞到好处的“乱世英雄”，或可称为“投机型”。当然有的人可能并不单纯就是某一种类型而是兼有不同类型的特征。此外，对运动走向影响不大但却人数众多的，则是芸芸众生中的随大流者了，他们或可称为“随大流型”。黄荣华就应该算是这种“随大流型”中的一员。

黄荣华这个“造反派头头”的头衔非常名不副实。她并无造反的动机，只是阴差阳错地被时代大潮推到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中，又被推到了群众组织的“总部常委”岗位上，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还把她推到了市一级的“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委员的位置上。因此，她完全应该算是造反派中的“另类”。

正因为她的“另类”，才使她回首往事的时候，能有一些比许多原造反派人士更清醒的认识。因为她基本上没有陷入政治狂热中（除了从北京“八一五会议”回来后奉命宣讲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那一小段时间外）。她的身世，她的家庭状况，她从小所接受的教养，她的微不足道的个人追求，都使她时时盼望的是文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好早点安定下来恢复正常生活，好加工资……历史已经证明，政治狂热会使人失去常识判断能力。而正是置身于政治狂热之外的众多普通人，往往比那些政治风云人物具有更清醒、更本能的常识判断能力。比如打人、杀人或编造罪名整人，对于黄荣华这样的普通人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的，而对于许多政治风云人物或被政治狂热所蒙蔽心智的非风云人物来说，则可能在某种前提下（如为了革命，为了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最高领袖……）就是可以的甚至是必须的了。

黄荣华能跳出对文革的留恋和迷信，还因为她的婚姻。她因文革中的一次次耽误，错失了几次本来可以成家的婚恋机会（这也是她回忆录中值得关注、很有时代特色的一个重要内容）。直到她在文革结束后遭到清查打击，青春不再的时候，才做了大龄新娘。用她的戏谑说法，是“左派”（造反派，共产党员）嫁给了“右派”（她丈夫是在“反右派”运动中惨遭“阳谋”的受难者）。而这个婚姻，不仅使她有了一个小家庭，而且使她从丈夫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她从来不会想到的“毛泽东时代”的阴暗面，她丈夫那一代所谓的“右派”们蒙受的冤枉和遭遇的大苦大难，使她对自己因文革而蒙受的冤屈不再那么难以释怀，也使她对毛泽东及其创立的体制逐渐有了一些清醒的认识，这就使她不像许多造反派人士（特别是在文革结束以后受到过清查打击的人士）那样继续盲目地迷信毛泽东及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我是在帮助原重庆反到底派一号负责人李木森整理回忆录期间，与黄荣华认识的。听她谈起文革中的经历，觉得非常有趣，也非常典型，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独特人生，我就一再鼓励她写出来。看来她也早有诉说的愿望，能够用文字写下来，也是一种很好的向后人、向历史诉说的方式。她一旦决定写，就非常认真地投入，并且在很短时间里学会了用电脑写作。从她前后几稿的文字可以看出，她几年来在回忆录写作中不断在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我有时都为这个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后来又长期从事技术工作的老大姐遣词用字的能力和叙述的细致生动感到惊异。当然，最让我觉得有价值的，是她对当年许多真实思想的表述。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女工，如何被卷入文革大潮之中，如何一步步身不由己地被推到风口浪尖，直到最后遭受莫须有的打击……她都女性的细腻进行了朴实无华而又引人入胜的记录。当然，有时也免不了如她自嘲的“像祥林嫂一样”，忍不住把同样的一些事或心理感受反复诉说，这些地方我在整理时都帮她做了精练。

从2008年初开始为她整理这部回忆录以来，她自己又反复修改了几次。有些史实细节她还反复找当事人核实，力求订正因年代久远而在记忆中出现的差错。这样断断续续拖了几年，现在总算完成了。

这不是一个文革风云人物的斗争史，而是一个普通女工在文革中的生活史、家庭史、婚恋史以及个人命运史。本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反映了那个动乱年代的一些侧面。但愿读者在读过之后能对亲历文革的那一代人中间的芸芸众生能多一分了解，能增加一些对那个特殊年代的见识，也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2013年4月10日于重庆风江阁

【研余杂记】

我同任冬林先生的一点交往

王 锐

一晃，任冬林先生不幸离世已近一年了。我和任冬林先生只有过一面之交，但却朝夕相处了整整一周，彼此相谈机会很多。分手后，又多有电邮交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任先生人生最后时光对其了解较多的一个友人。

2013年春节前夕，我向任冬林先生发了一个问候性电邮，却意外没收到回复。心里多少有点诧异，但也没多想。以后一直无消息。直到5月底见到《昨天》第17期上，何蜀先生发的那则“讣告”，方知任冬林先生已于年初的1月24日凌晨不幸逝于睡梦中。

好好一个人，很爽直的一个同道朋友，说没就没了。心中那份戚戚忧伤，很久很久仍挥之不去。又念想自己，一是更要多加保重，二要更加珍惜相当有限这点光阴，那是因为想做的事，许多还没有做完做好，甚至还没动手去做。年岁如此，随时可能“说没就没”。

最早知道任冬林先生，是从《记忆》总69期读到专为他编发的“拾荒者专

辑”。因自己也搞一点收藏，对相关的人和事，兴趣自然多一点。对任先生完全“白手起家”（收藏及相关研究都是）的精神事迹，很是赞赏敬重。

转眼到了2012年春，北大印红标教授发来电邮，相邀于当年7月，在京召开一个关于文革资料收集与研讨的学术会。其正式名称是：“中国政治的民间文本（1949-1979）”。主持人正是印红标教授，会期一天。外地赴会者可有500元食宿补助。印教授还发来了相关资料。

我当然想去。可是我等“体制外”身份，无处报销车旅杂费。我所在那三线城市，最便宜的火车，赴京车费，来去起码一千，还不算住宿等其他开支（往返均须成都住一晚）。何蜀先生知道我这难处，转告了北京方面的朋友。后来，吴迪先生那里有邮件发来，《记忆》编辑部愿为我等外地赴京人士，另补贴一千元会务费。得信后甚喜甚谢。遂作赴京与会准备。

印教授是办事非常细致周到的人，给人的感觉，其身上颇有民国文化人，早年北大教授那种古风。会期临近前，他发来邮件，不仅仔细讲了从北京西站下车后，如何换乘公交，到哪站下车，下车后如何走法才能到住宿旅店，沿途带标志性的店招等等，而且还对是否与人同住一间客房征询意见。印教授最初拟安排与我同住一客房的，正是任冬林。

印教授在邮件中很客气地问我：“打算安排你与湖南任冬林先生同住一间客房，不知可不可以？”我连忙回复：“可以可以，很高兴与任先生同住一客房。”不想两天后，印教授又来电邮说，情况有些变化，任冬林先生将与夫人一起来京。因此安排调整为我与湖北李晓航先生同住一间。问我可不可以。我亦当即复邮件表示可以。

后来在北京，与任先生熟了，有次闲聊，我提起这事。任先生笑了笑，有些难为情地说：“那不行的，我睡觉要打鼾，很厉害的。会影响你睡觉。”我也半开玩笑回应说：“我睡眠好，不怕打鼾。有回碰上个厉害打鼾者，一晚上狂轰滥炸，我照睡不误。”当时说过了就说过了，没有认真当回事。直到见到讣告，知任先生竟然不幸逝于睡梦中，才有点后悔，当时真该刻意提醒一下任先生，多注意这打鼾的毛病。能否找医生，最好减轻点打鼾的严重程度。

我在医院呆过，多少知道一点。所谓打鼾，其实就是睡眠时，因体位变化，呼吸器官形成某种阻塞，引起的呼吸不畅。严重时，人无知觉情况下，可能引发短暂呼吸中断。而这种短暂呼吸中断，若不及时纠正，则可能造成致命后果。任冬林先生1月24日病逝于睡梦中，我推测，很可能就是打鼾毛病严重时，引发呼吸中断最后脑缺氧而逝。当然，仅是推测而已。

我抵京后，按印教授邮件中的详细指点，顺利地寻到了住宿地——“燕园社区招待所”。最先见到的，正是任冬林先生。相见之下，彼此都非常高兴，尽管是第一次见面。任先生体形壮实，脸色较黑，待人热情，一脸憨厚相。是那种有亲和力，容易一见如故的人。从任先生口里得知，这次外省来赴会的，只有我们俩和湖北李晓航先生。他和李到得比较早，下午已去开会的打探过了。

研讨会会期是15日下午。上午未作安排，有半天空闲。早晨起来，任先生过我们房间，邀一起出门走走。李晓航先生不想走，仅我同任夫妇外出散步。大街对面，即是北大园区。正逢暑假，有不少外省中小学生，被老师或家长带来首都，提前感受北大与清华的“灵气”。那一阵，北大清华校门前每天人潮涌动。

任先生提议，不如去北大校园走走。我也没去过北大。三人就一起排入队列中，欲蒙混过关。第一次，混在东北一中学队列后面，被老师当着北大保安的面指认逐出，挡在门外，很是尴尬。我不服气，上前找保安交涉说：“我们是外省

来北京开研讨会的，想去北大参观一下有什么不可以？都这么大年岁了，好忍心让我们在门外晒太阳？”

这一说，还真见了效，保安高抬贵手，放我三人进去了。那个上午，我们基本上就在北大校园里闲走。在绿荫遮蔽的小道上，边走边谈。乏了，在未名湖畔的石凳上坐坐。因无熟人指点，我最想去的沙滩“红楼”，和“民主广场”，却不知其所。一个上午走下来，我和老任，已似乎成了交往多年的朋友。

看得出来，任先生对这次赴京研讨会事先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他带来了几十册已装订好的打印资料。详细介绍他的一些藏品并稍作评介，还附有照片。每册数十页，我估计，不算排字，光复印费一册就得10来元，几十册即数百元。下午的研讨会，任冬林先生作了发言，并散发了大部分资料。老任湖南口音很重，且口齿有些含混。同他面对面闲聊，我得仔细听，且连听带猜，有时还得让他再讲一遍，才能明白。那天发言，好在他散发了材料。

研讨会结束，两位主持人吴迪先生与印红标教授，有些抱歉地对大家讲，因经费原因，没有安排晚餐。若大家想聚一聚，只能实行AA制，欢迎自愿参加。我们三名外地与会者都参加了。吴迪，印教授，《记忆》编辑部的戴为伟，及其他数人，就在西郊饭店附近的一家餐馆围聚一桌，那氛围，颇多留忆处。那一阵，吴迪先生腰病发作，走路都着拐杖。但他仍抱病与会主持并有专题发言，还坚持与大家晚聚一番后才依依握别，令人感动。

李晓航先生当晚夜车回湖北。有意思的是，我和任冬林先生恰恰都是事先订的21日的返程票。任先生夫妇是上午，我是晚间。任先生与夫人想逛逛北京一些著名景点。我亦多年未来北京，主要想趁此机会拜望一些朋友。除四川来京发展的家乡朋友外，还有就是在2006年锦州渤海大学出席文革研讨会时结识的吴思、丁东、岳建一几位学者，以及作家老鬼等。此外，还想有机会的话拜访一下徐友渔先生，就四川文革研究等当面对教。不过，赴京之前，有另外的北京朋友告诉我，因那个众所周知的大会原因，北京此时已处于一种“非常状态”。我想见的一些人，已处于被“保护”情况，恐怕见不了。

那天晚上，有北京朋友来招待所看我，证实了这情况。还说，最近某单位拟举行一个什么研讨会。邀请名单中有学者崔卫平，报上去后，一审查，见有崔，干脆连这次研讨会也一并取消了。看来，我这几天留京时间，得另作安排。

老任夫妇第二天想去参观“鸟巢”，“水立方”等。邀我同行，我不想去。在我心目中，那不过是国家级的“面子工程”而已，不值得我去花时间。正盘算第二天如何安排，没想，一场突降的急病把一切全打乱了。

其实，晚餐时，我就感觉有点不对：气喘，时有咳嗽，有痰。到晚上，症状加剧，发起烧来。我知道这是因感冒引发支气管感染了。都怪来京火车上空调开得过低所致。

从发病那晚上起，我开始服自带的口服抗感染药——安必仙。我年轻时就有支气管扩张老毛病，一感冒，必引发支气管感染，严重时，会造成肺炎。所以我出门，都随身带药，这安必仙（其实就是口服抗菌素）必备。

清晨，我听老任又在窗外喊我，问我随不随他夫妇一起游览？我说我生病了，不去。老任忙问，有什么问题没有？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赶紧说不用不用，问题不大，我自己带有药。老任又叮嘱几句才走了。

大概早饭过了不久，印红标教授来了。我强撑起身，印教授见我病了，很关切，又有点担心。他取来体温计，一量，我体温已达39度多。印教授有些急了，要送我去医院。我说不必，我已服药了。印教授见我没吃也吃不下东西，就回家

给我熬来稀粥，并带来腐乳。如此一连三天，每天早上，印教授都送来热粥和腐乳。真是感谢印教授的关心与照顾。印教授还是不放心，又给我家里去了电话，还给重庆何蜀先生也去了电话。家里很快来了电话。何蜀先生也来电话问候。我告诉说，是感冒了，支气管有点感染，不过问题不大，正服药，让他们放心。

晚饭后，任先生夫妇回来了。其时印教授也在。我体温仍在 39 度以上，除了早晨那点稀粥，一天未吃什么东西，很虚弱。老任见此情形，当即很决断地说：“走，我送你到医院，立即去！”老任表现出来的热心和乐于助人精神，令人感动。不过我坚决地拒绝了。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即对自己身体状况和前景有足够把握。我自己清楚，除了支气管和肺部有些毛病外，其他无大毛病，尤其关键的心血管系统没问题，保证了其间不会出现大的意外。这点我自己有信心。最近几年遭感冒引发的这类感染，都是这样自己诊治服药过来的，从不去医院。况且，去医院，不外用抗菌素控制感染，输点液什么的。与我眼下服安必仙的效果差不了多少，也最快要两三天才能见效。

谢天谢地，最难的两天终于过了。第三天，体温开始下降，支气管症状明显好转。第四天，多少能吃点东西了。印教授和任冬林先生都很高兴，也松了口气。

以后那些日子，我基本上就呆在旅店房间，卧床静养，或读点书消遣，哪儿也没去。20 日上午，才出门乘车去中关村走了走，又逛了逛旅舍旁的小书店。其间，吴迪先生和《记忆》编辑部戴为伟女士，也打电话来问候，还说过来看望，我怕麻烦人家，道谢后连称不必。

那几天，老任白天同夫人外出，下午或晚上回来，必过来看望问候，说点闲话，陪我聊聊。由此，彼此的了解也更深。有天，他问我认不认识崔永元，又打听有没有接触崔永元的渠道。我自然是没有。问之，说是想找找崔永元。为何事却没说。推测之下，可能是想让崔为之呼吁或推荐。以我旁观者角度，怕很难。崔已成明星，求事者多，自身揽事也多。真见到了，想助之怕也是有心无力。

我知晓他这些心思，就说，待回川后，我可以把当年锦州研讨会时结识的吴思、丁东、王海光等一批知名学者的电子邮箱告诉他。他可自行与之联系。老任对此很高兴。说，他收有一本订成册的文革企业报纸，不知是不是文革小报，回湖南后，邮来赠我。

离京的前一天下午，我和老任商议，晚上聚一聚，把印教授请来，由我们两人做东，聊表谢意。那晚，印教授如约来了，另有老任一位湖南同乡，几个人就在那家烤鱼馆子，把酒饮谈，小聚甚欢。并留影作别。本来说的是我与老任 AA 制，但最后老任坚持由他买的单。

21 日清早我还在床上，老任于窗外高声作别，并邀我有机会到岳阳做客。他们是中午 11 时多的车，说是一天即可返家。我上午近 11 点左右，才在一位北京朋友陪同下离开旅店。那时，已开始下雨，揭开了北京“七二一”大雨的序幕。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这场大雨会成为全球关注的事件，自己有幸成了亲历者。

返家没两天，我即将相关学者的电邮，发给了任先生，并邮赠了自己出版的两册小书。不久就收到任先生回复。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说：“这次真的要好好感谢您了，您介绍的几位老师基本上都给我复信了。”

其中特别提到中央党校王海光教授，老任甚至把王教授的回复，也转发给了我。王教授写道：“冬林先生：非常高兴收到您的来信。您的收藏非常有价值，我看了惊叹不已。在您的宝贵收藏中，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工作笔记系列。我与上海华东师大当代史研究中心联系紧密，他们现在正在收集出版民间史料，已经出了十册。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推荐一下，让他们选择出版几本，以提供社会使

用。……得多方位多角度复原历史。您的工作就是一个复原历史的视角。对于我们渐行渐远的过去岁月，您是敢于担当历史的人，是保持我们历史记忆的有心人。非常高兴与您结识。”

不多天，又收到老任从湖南邮来的一叠小报。果然是文革时期的矿山企业报之类，算不得小报。这种企业报，都是党报一类所谓“正面文字”，无多大收藏或研究价值。但毕竟是人家一份心意。我当即回复表示谢意。

以后我们之间电邮联系交往一直不断。大概看我出了两册书，老任有次来函称，要我做他写作上的“老师”。他今后写了什么，先发过来让我看看，改一改。这事当然不可以。稿看看，提点意见建议可以。当“老师”改稿，肯定不行。我客气回复。此后一信中建议他，以他收藏为依据，或地方文史为题，或以某个专题为主线，先写些不长的文章，在地方或其他报刊发表，积少成多，渐会有收获。

没想，10月上旬，任冬林先生发来电邮：“说来自愧，本应我时常向先生请安，但不幸的命运仍时常缠绕着我。从北京回来，我老婆患乳腺癌不得不入院接受手术及四个多月的化疗。命该如此，只好泰然处之。”

老任夫人在北京多有相处。看上去比老任年轻很多，人也贤惠，印象不错。没料仅三两个月，就遭险症。不免让人感叹人生无常。

老任邮件中还说：“现将我最近两个多月内完成的《母亲文革双开及其家庭地主成分那回事》及《父亲在交待中写春秋》发来，这些文字都是根据我父母亲生前留下的资料整理而成……先生如得闲且感兴趣的话帮我修改一下不知是否可以。”

我复函对老任及夫人深表问候，并答应将两个材料仔细看过后，再谈谈看法及修改处。这两个文字，我仔细看了，总的感觉，资料及人物经历确有些价值。但平心而论，老任文字有些乱，要修改好有点费事。

11月中旬，从老任那里传来一个好消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邀请老任做访问学者事，有了结果。对方正式发了邀请函，请他于2013年3月至4月到香港中文大学一个月访问学者。这当然是大好事。老任表示，“我会很好的珍惜这一次学习写作的机会”，还向我咨询，不知该做些什么准备才好。

我当然对老任表示祝贺，又告诉他，我没做过访问学者，对此毫无经验可言。不过，想到让他准备一次讲座的事，就建议他在讲座准备上尽量充分一些为好。

这之后，就再没收到老任从岳阳发来的信息。我想他可能在全力准备来年3月访问学者的事，没太在意。这样，一直到元旦过了春节来临，发出那封问候电邮，直到5月份在《昨天》上见到何蜀先生发出的那则“讣告”。

这则“讣告”上提到，任冬林先生，是1月下旬，从香港归来后不幸去世。就不知任先生这次去香港，是提前去中文大学访学？还是去作旅游性打探的前期准备？

谨以此文献给任冬林先生，并寄哀思。

2013年11月末 自贡危楼书屋

【编读往来】

边犊：2013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一、几十年后审判的文革杀人案。2013年2月18日，浙江瑞安法院刑庭法官上门公开开庭审理81岁老汉邱日仁文革时期故意杀害洪云科一案。1967年文革时期，与邱同村的乡村医生洪云科因被怀疑为对立派“探子”，被一派群众武装组织指派邱日仁等人用麻绳将其勒死。为埋尸方便，邱用锄头砸断尸体下肢后埋入坑中。1986年当地公安局发出逮捕证后邱逃亡在外。2012年7月，离家数十年的邱日仁在瑞安被捕归案，2013年3月2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二、儿子的忏悔。2013年2月20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与文革历史有关的行政诉讼案。原告张红兵，其母方忠谋文革时为蚌埠市固镇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之夫被定为走资派遭到游街批斗，方多次被拉上陪斗，其女儿在红卫兵串联中病死。在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方忠谋被扣上“特务嫌疑”“地主分子”的帽子长期隔离审查和批斗。1970年2月13夜，方忠谋在家里明确表示支持为刘少奇等人翻案，并批评毛泽东以及对毛的个人崇拜。当夜方忠谋被丈夫和儿子张红兵举报，方随即被县军管组羁押，第二天被县革委会以“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等定罪，随后经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批准判处死刑，于1970年4月11日枪决。1978年后方忠谋获平反昭雪。而当年的中学生红卫兵张红兵也开始反思和忏悔。1982年，张红兵及其亲属向当地生产队购买了方忠谋遗骸掩埋地，张红兵在保护墓地过程中萌生为其母亲墓地申请省级不可移动文物想法，这也是现已年近60岁的他为自己文革中的作为深刻忏悔的行动之一。因其申请未获县文广局同意，引发行政诉讼。

三、上海两位文革风云人物潘国平、安文江逝世。文革中名噪一时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发起人和前期负责人之一潘国平，2013年4月18日在上海新华医院逝世，终年67岁。潘国平在“安亭事件”中是代表工人造反派与张春桥谈判的首席代表，后因个人原因和与王洪文的矛盾而在“一月夺权”后逐渐被边缘化，文革中曾受到审查，文革结束后仍被判刑。后曾赴美国。在美国居留期间曾接受采访，《北京之春》40期（1996年9月号）发表有署名亚衣的《工人造反派与中国人权运动——访原“上海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上海文革初期三大红卫兵组织之一“红三司”的主要负责人安文江，2013年9月6日逝世，终年69岁。安文江在文革开始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其领导的“红三司”最有影响的活动是1967年1月接管上海市公安局以及其后对张春桥的“一·二八炮打”行动。1968年安文江赴江西武山铜矿当矿工10年，并受到审查。1978年平反后曾任子弟学校教导主任，后曾任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理事、佛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生前写有充满反思与忏悔意识的回忆文章《我不忏悔》（载徐友渔编《1966 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

四、向文革受难者道歉。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第六期刊登原红卫兵刘伯勤的道歉广告，引起极大反响。随后各地又有多起向文革受难者道歉的消息报道。8月20日，原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文革中曾任北京

八中校革委主任）的道歉信在北京八中老三届同学会博客发表。10月7日，陈小鲁主持道歉会，向八中文革中受过红卫兵批判凌辱的老师们道歉。他指出，目前大陆社会出现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2013年11月14~17日在苏州举办的“历史嘉年华”（由新历史合作社与中国金融博物馆共同发起主办，中国基金博物馆承办，腾讯网、大苏网协办）活动中，“致敬年度历史行动者”原安排向文革道歉者致敬，但受邀道歉者都表示拒绝出席，认为近期媒体宣传已经够多，希望为此事打上句号，道歉只是做人底线，也不敢担当“历史行动者”之类头衔。

五、学者张显扬逝世。2013年9月18日，学者张显扬病逝，终年77岁。他在文革中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即预言文化大革命破产了，毛泽东破产了，此后即开始研究文革和毛泽东。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张显扬在《文化大革命应设一个专题议一议》的建议中，提出从五个方面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教训。1987年，张显扬退党。

六、学者高文谦“下战书”。2013年10月14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认为该书“多处罔顾历史事实”，“用个人想象代替客观描述”。中国大陆各大网站纷纷转载。10月21日，《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在《中国人权双周刊》发表《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驳李捷兼下战书》，提出愿与李捷公开辩论毛的功罪是非，希望大陆当局开放网禁，允许大陆民众观战。高文中还指出李捷文章完全与学术讨论无关而是政治目的的攻击，多处大段照抄九年前已被驳得不敢再应战的司马公批《晚年周恩来》的文章，而且有的地方还抄错了。高在文中说：“十年前《晚年周恩来》出版后，我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毛时代时曾经表示：那是一个贫穷和饥饿，恐怖和血腥的年代，毛是现代中国一切灾难的始作俑者。毛为了己一己之私——发动，大跃进闯下大祸后，唯恐身后被‘党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清算，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推入文革十年浩劫之中。毛时代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也超过希特勒的大屠杀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七、北大一个研讨会。2013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史丹福中心举办马若德（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MacFarquhar）荣誉学术研讨会“21世纪书写毛泽东时代的历史（WritingHistoryoftheMaoera inthe21stCentury）”。会议收到的论文（包括提纲）中与文革有关的有：安迪·沃德（AndrewWalder）《中国的造反与镇压：1966-1971》（*RebellionandRepressioninChina: 1966-1971*），董国强《派性身份、个人处境与政治抉择：从地方视角看文化大革命》，弗锐德·泰威斯（FredTeiwes）《追寻历史上的毛：毛之言行的考察》，李丹慧《关于毛泽东内外政策调整与国家利益的背离问题——以1960年代中苏关系为视角》，牛大勇《九一三林彪坠机原因的新史料和新见解》，沈迈克（MichaelSchoenhals）

《OnIntelligence（论情报）》，孙万国《文革前夕毛泽东致江青信的真伪》，萧延中《毛泽东时代（1949-1976）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法刍议》，唐少杰《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印红标《大字报、大民主与互联网》，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杨奎松《毛泽东时代政治贱民阶层的形成和影响》等。

八、纽约的 2013 文革公共论坛。2013 年 10 月 12 日，天问联合学会在美国纽约召开“2013 文革公共论坛”，大纽约地区各界华侨、留学生共 40 多人出席。此次活动由天问联合学会副会长、文化学者吴称谋先生主持，天问联合学会会长、宪政学者张博树博士致开幕词。有十位演讲嘉宾做主题讲演，从不同视角来回顾、反思、忏悔、总结文革这段历史：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退休研究员姚监复论述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否会出现；作家任彦芳回顾了自己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著名摄影家李振盛讲述了他在文革中摄影的种种经历；文革史专家丁凯文论述了“文革初期毛泽东在军队方面是如何部署的”；文革研究专家邢达昆重点讲述了“为什么说中共九大是毛泽东的失败”；独立学者冯胜平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分析了“忏悔与反思”对我们这个民族、对每一位国人的重要。此外，著名作家姚蜀平、独立学者龚和、青年学者陈闯创和李莹也都做了精彩演讲。著名媒体人北风通过网路现场直播了全程实况。本次会议的论文已收集在《历史期待拐点——重审文革与探索未来》一书中，该书将于 2014 年春节前后问世。

九、红雨斋博客的文革史笔记。2013 年 12 月 8 日，长期关注文革历史的红雨斋博客发表《文革史笔记之七十三：2013 年逝世的十位文革名人》，独立统计了：①1 月 6 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委何云峰在福州逝世，享年 91 岁。何云峰 1969 年以 13 军政委的身份兼任重庆市革委会主任。②1 月 7 日，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李俊逝世，终年 91 岁。李俊生前曾先后执导故事片《回民支队》、《农奴》、《闪闪的红星》、《归心似箭》和《大决战》等。③2 月 10 日（大年初一），中国乒坛宿将庄则栋在北京病逝，终年 73 岁，庄则栋文革期间曾任国家体委主任。④2 月 14 日，原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原副校长谢飞在北京逝世，享年 100 岁。谢飞是刘少奇的第二任妻子，文革中因刘少奇“问题”被关押审查。⑤4 月 24 日，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主席倪志福在北京逝世，享年 80 岁。⑥6 月 27 日，原七机部军管会主任韦统泰在北京逝世，享年 95 岁。韦统泰文革中任 54 军军长、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机部军管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因受林彪事件牵连，被审查两年零八个月。⑦7 月 22 日，辛国治在山东青岛逝世，享年 92 岁。辛国治文革期间在北海舰队任副政委时，因林彪事件受到冲击。⑧7 月 23 日，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黄德懋在北京逝世，享年 94 岁。黄德懋文革中 1968 年 5 月以 40 军军长身份出任锦州市革委会主任、辽宁省革委会委员等职。⑨8 月 24 日。文革时期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后任教育部部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的刘西尧在武汉逝世，享年 97 岁。⑩8 月 25 日，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

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刘复之文革期间曾被关押审查。

十、习近平讲话。2013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其中提到被毛泽东自视为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时，作了如下评价：“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宗庶：2013 年文革题材出版物选目

**2013 年出版的文革题材及包含有重要文革内容的出版物，据不完全了解有：
中国大陆出版物——**

胡发云著《迷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 1 月。

刘儒著《命运：一个家庭的 60 年》，工人出版社，2013 年 1 月。

江子顺著《人生留书：一位老共产党人的家书、日记、摘记》，解放军出版社，2013 年 1 月。

杨健著《1966-1976 的地下文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 3 月。

周敬青著《解读林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4 月

葛剑雄编《谭其骧日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年 4 月（1998 年文汇出版社初版）。

金春明著《“四人帮”沉浮录》，九州出版社，2013 年 5 月。

肖岫著《革命·运动·法制——八十一岁忆人生》，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年 5 月。

苗欣著《厚重与天真：一个诗人的日记（1950-2012）》，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年 5 月。

吴国韬《雨打芭蕉——一个乡村民办教师回忆录（1958—1980）》，语文出版社 2013 年 5 月。

徐铸成著《徐铸成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 5 月。

康庭梓著《真相 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年 7 月

顾保孜撰文、钱嗣杰摄影《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年 7 月。

程中原、刘仓、夏杏珍著《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 年 7 月。

奚学瑶、张从、孙兰芝主编《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九州出版社，2013 年 8 月。

陶斯亮著《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和我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年 8 月。

王学泰著《一蓑烟雨任平生》，重庆出版社，2013 年 8 月。

王学泰著《监狱琐记》，三联书店，2013年10月。

沈博爱著《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语文出版社，2013年10月。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

杏花村知青著《遥指杏花村：140名北京知青的插队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

郇中建著《五味青春：一个知青的自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芒市委员会编《难忘第二故乡：云南芒市知青岁月》，人民出版社，2013年。

杭州图书馆编《迁徙的人生：杭州知青往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

港台及美国华人出版社出版物——

唐金鹤著《倒下的英才》（修订版），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1月。

阎长贵、王广宇著《钓鱼台忆往——江青随员的证言》，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3年1月。

丁凯文著《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香港：明镜出版社，2013年2月。

孙怒涛著《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

启之著《揭密中国电影 读解文革影片》，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3月。

耿鼎法等著《耿刘氏和她的儿女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3年4月。

阿朋著《没有选择的青春：山西插队十年》，美国：溪流出版社，2013年4月。

启之著《狂飙错乱的毛时代》，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

启之编《故事不是历史：文革的纪实与书写》，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

周孜仁著《岁月回望录 红卫兵小报主编的家族追忆》，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4月。

王光照著《这里 那时 潮起潮落——武汉锅炉厂文革纪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5月。

余汝信编《“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

王辉著《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兰台网路出版社，2013年5月。

米鹤都编撰《孔丹口述：难得本色任天然》（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之三），香港：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6月。

米鹤都编撰《光环与阴影》（回忆与反思口述历史丛书之四），中港传媒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年7月。

张怀英著《大寨·陈永贵——我的思考与回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9月。

王增如、李向东著《上山下乡》，人间出版社，2013年9月。

顾保孜撰文、钱嗣杰摄影《毛泽东非常时期非常事 1964-1969》，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9月。

夏家保著《蝉鸣录——八十回眸》，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10月。

遇罗锦编撰《遇罗克与“中学文革报”》，晨钟书屋，2013年10月。

徐景贤著《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13年11月。

聂树人著《北京天地两派的斗争》，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12月。

聂树人著《三司与〈首都红卫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12月。

黄荣华回忆、何蜀整理《我怎么成了“江青的干女儿”——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八一五派代表黄荣华自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12月。

何蜀主编《昨天——2012年〈昨天〉精选》，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12月。

蒯大富著《清华文革五十天》，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12月。

红鸥著《迷茫——十年浩劫（1966—1976）亲历》，香港：时代作家出版社，2013年12月。

丁学良著《革命与反革命追忆：从文革到重庆模式》，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南怀沙著《文革之火》，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南怀沙著《饥饿的小城：麻色文革首部曲》，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南怀沙著《挖山洞的大兵：“麻色文革”最终曲》，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2013年。

胡金兆著《文人落难记：田汉、孟超、陶君起、张君秋、郭小川的文革遭遇》，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蒋秋华编辑《文革时期评朱熹》，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张学祖、张健编著《林彪》，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晓龙著《文革生死劫》，美国：柯捷出版社，2013。

金鲁贤著《绝处逢生 1916-1982：金鲁贤回忆录上卷》，香港大学出版社，2013年。

林达光、陈恕合著《走入中国暴风眼：林达光回忆录》，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3年。

阎长贵谈杨宝智文

我读了杨宝智先生的《一个“右派”参加造反派宣传队的经历》，觉得这样的文章很好。杨先生是长我两岁的同龄人，我们所经历的时空基本相同，他的表现和心理状态，我完全可以理解。一个“右派”或“摘帽右派”，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处处都要谨小慎微，并有真诚的或有意的适当表现。这样的情况我亲眼看到过。通过杨先生的文章可以比较具体地了解文革的一些事情和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全民性的又是长达十年之久的运动，可以说人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包括以“逍遥派”的态度和形式）参加了，人人的灵魂都受到触及了，因而也都反映和表现出来了，恐怕人人都有一肚子话（或一些话）要说——“一吐为快”，那就让我们把它说出来吧！若人人都回忆一下，并形成文字，对自己、对家人和子女、对社会、对历史都是有益的；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清华学生陆小宝（他大概也是年近“古稀”左右的人了）先生说这是“我们的最后责任”，我认为这是一句充满强烈历史感的经典名言。虽然这样说，不可能人人都这样做，即使有一部分人这样做了，这对恢复文革历史真相，写出一部有血有肉的实实在在的真正科学的文革史也大有好处。希望有更多的人这样做。这是我读杨宝智先生文章的一点想法，写出来供人们参考。

另外，文中提到“突破口”问题，使我回忆起中央领导人接见刘结挺夫妇的情况。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1967 年春天（3 或 4 月的某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时我在场，从总理到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深切地同情他们受“迫害”的遭遇，激昂慷慨地支持他们造李井泉和四川省委的反，至于这些领导人究竟说的什么话没印象了，会场气氛弄得我也很紧张，认真回想和思考我有没有收到过刘结挺夫妇的投诉信而没向领导报告，还给办信组负责处理江青信的人（我 1967 年 1 月给江青当秘书前是江青办信组的组长）打电话询问有没有收到过他们夫妇的投诉信等等。十分显然，刘结挺夫妇成为四川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即他们的崛起，完全是当时中央支持的。